古巴独立史

〔古巴〕艾·罗依格·德·卢其森林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古巴独立史

〔古巴〕艾·罗依格·德·卢其森林著

张　焱译　王怀祖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milio Roig de Leuchsenring

CUBA NO DEBE SU INDEPENDENCIA
A LOS ESTADOS UNIDOS

Ediciones la Tertulia, La Habana 1960

根护 ［illegible］版社1960年增订第三版译出

古 巴 独 立 史

〔古巴〕艾·罗依格·德·卢其森林著

张 璩译 王怀祖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广印刷

1971年11月第I版

197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1002·446 每册0.50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作者艾米里奥·罗依格·德·卢其森林，是古巴著名的进步历史学家，除本书外，他还写过《何塞·马蒂》、《古巴和美国》等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叙述了从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古巴以来直至美西战争和美国强加于古巴的普拉特修正案止这一时期内，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殖民者和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所作的英勇斗争，同时，揭露了西班牙殖民者疯狂屠杀古巴人民的凶恶残暴的罪行和美帝国主义者同西班牙殖民者相互勾结又相互争夺古巴的阴险狰狞的面目。

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古巴人民几世纪来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所取得的光辉胜利，就是一

个小国战胜大国的侵略、鼓舞革命斗争的事例。

本书第一部分着重说明古巴的独立并不是靠美国获得的，而是依靠古巴人民自己的流血斗争赢得的。作者列举了古巴人民历次起义和革命的史实，特别论述了从 1868 年至 1898 年历时三十年反对西班牙殖民者反动统治的解放斗争，证明在反殖民战争的最后几年(1895—1898 年)，西班牙统治者已被古巴人民打得兵穷财尽、筋疲力竭，以至不得不承认，对他们来说，古巴“已丢失了”。而美帝国主义者这时却借故向西班牙发动战争，乘机取代旧殖民者的地位。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 1861 年指出：**“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北美内战》)本书第二部分用确凿的材料证明，美国历届政府不但始终没有支持过古巴人民争取古巴独立的解放斗争，相反却用各种办法阻挠古巴爱国者的革命活动，同时推行其所谓“熟果”政策，即等待适当时机由美国完全占有古巴，“当古巴不能为美国所有时就归西班牙所有，但永远不归古巴人所有”。这就大大帮助了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统治。1898

年，美国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这是一场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接着在1901年，美国政府通过普拉特修正案，取代西班牙强占了古巴，彻底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作者驳斥了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所说的古巴“需要另一个强大的邻邦——美利坚合众国，帮他们从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宗主国之下解放出来”的谰言，并进一步揭示出美帝国主义一向是古巴独立的敌人。

本书原名《古巴不是靠美国获得独立的》，1950年在哈瓦那出版，1960年出版第三版时作者做了修订和补充。中译本是根据第三版译出的，书名改为《古巴独立史》。

1971年11月

目 录

1950年第一版序言

古巴历史与国际研究协会自1940年成立以来，始终抱着这样一个宗旨——这在二年后开始举行的历届全国历史会议上得到了发展——：传播历史知识并推动古巴历史的研究工作，使其超出专家的范围，而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去。这样做，是为了使古巴人民永远坚定对自己民族历史发展的信念，并激发最健康的爱国主义，使我们的历史不至于被歪曲和伪造，从而使一切我们认为对重新评价我们殖民地的、革命的、解放的和共和国的过去必不可少的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同时纠正世俗的和伪专家们的谬误观念和错误的解释，澄清某些疑问，克服至今经常发生的不公正的疏漏或赞美现象。

我们协会特别重视的任务是：恰如其分地阐明古巴国家的形成过程，以及它取得独立的方式和所处的环境，同时明确指出参与这场斗争的真

正因素——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这些都是影响深远的问题。因为从人们对于古巴近两世纪来争取民主、自由、正义、文化和文明的真实斗争历史，特别是关于古巴三十年伟大解放战争历史的歪曲中，可以找到古巴共和失败主义以及在巩固和发展共和国过程中筹划失当的原因。

正象我们在古巴第四届全国历史会议中所指出的，人们曾恶意地或无意识地使古巴人相信，他们是这样一个倒霉的低能的和不幸的民族，甚至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使他们沦为西班牙奴隶的桎梏，去争取自己的独立，而需要另一个强大的邻邦——美利坚合众国，帮他们从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宗主国之下解放出来，并且给他们带来一个共和国。正是由于这种认为共和国先天孱弱的错误想法，才使古巴人几乎一直痛苦地生活着，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认为一切都得仰仗美国。

由普拉特修正案所规定和合法化的干涉，加深了古巴人对他们自己命运的怀疑和不信任，使我们在遭受难于避免的灾祸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把领土和经济命脉拱手送给外国人。

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公立学校放弃管理，而

私立学校又缺乏监督与整顿，这就加深了对历史的无知和对古巴的殖民地的和革命的过去的歪曲与伪造；这种无知常被庸官昏君和政客们所利用，以掩饰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卖身投靠。

虽然，古巴国家的这一形成过程以及它取得独立的过程，已经得到古巴历届全国历史会议热情的重新评价，会上对这两个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并且已经在哈瓦那市文史馆编的《哈瓦那历史笔记》上发表；古巴历史与国际研究协会仍然认为，必须坚持把这些历史真相广为宣传，因此，在协会今年 8 月25日的行政会议上，我们受托编写本书；正是为了上述目的，我们今天将它大量出版，献给古巴人民。

古巴历史与国际研究协会

1950 年

第一部分

古巴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了独立

1

古巴这个国家，不是象在重大的世界性军事冲突之后出现的一些国家那样，在国际会议桌的地图上设计出来的列强间协议和阴谋的结果；也不是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不同的敌对地区间合并的产物；它的存在，更不是其他国家的恩赐。依靠其他国家的援助——在必要的情况下——，是决不会使它在法律上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的。

恰恰相反，古巴国家的产生是这块土地上的儿女，为暂时地或将来永久地解决古巴人民在殖民统治各个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寻求正确的政治制度和准则的理想与行动长期演变的结

果。这也是古巴人民要求民族统一的觉悟形成和塑造的过程。

详细地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会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些古巴人——那些受到宗主国政府正当保护和保障的移民们是怎样曾试图在西班牙的统治下，寻找祖国的幸福和昌盛，他们有时实行一些适应古巴需要和进步的改革，有时实行政治、经济和行政的自治，以使克里奥尔人[1]的各项活动既不受西班牙政权的限制和剥削，又能在现状下自由发展，从而使古巴通过演变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府，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革命手段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震动；美洲大陆已独立的那些英属殖民地所获得的虚假的自由和福利，使他们感到迷惑，因而渴望并入北美合众国，使古巴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在某些情况下，希望更快地消除西班牙宗主国的暴虐统治的强烈愿望促使人们同情和接受这种合并主义的倾向。

这一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顶峰，就是伟大的独立革命政治运动，它的序幕是平原农民为了争

① 克里奥尔人，指在古巴生长的白人。——译者注

取经济解放、而于1717和1723年先后发动的两次反对西班牙帝国主义的暴动[1]。这次解放运动以罗曼·德·拉·路斯、路易斯·弗·巴萨贝和霍金·英芳特[2]策划的起义(1810年事情暴露而流产)为开端,于1898年告终。在这次运动中,不能不提到1812年由奴隶何塞·安东尼奥·阿蓬德[3]领导的为争取种族解放而爆发的起义,也不能不提到1844年称之为“埃斯卡莱腊”的维护奴

---

① 1717、1720和1723年,哈瓦那地区及古巴东部的种植烟草的农民举行声势浩大的起义,结果迫使西班牙殖民者废除了1717年实行的烟草专卖制度。——译者注

② 罗曼·德·拉·路斯(Román de la Luz),原是一个富裕的土生白人,1810年反对西班牙统治者的暴动,是以他为首的一批分立主义者在哈瓦那密谋组织的;霍金·英芳特(Joaquín Infante)则是巴亚莫的一位著名律师,当时曾起草宪法,第一次宣布古巴独立。——译者注

③ 在海地岛1790—1803年奴隶起义的直接影响下,1812年古巴东部(奥连特和卡马圭)爆发了一次当时规模最大的黑人起义,提出建立独立的黑人共和国的口号。起义的领导者是自由黑人何塞·安东尼奥·阿蓬德(José Antonio Aponte)。参加起义的不仅有黑人、黑白混血种人,而且还有贫穷的白人。这次起义震动了整个古巴,但不久受到殖民政权的残酷镇压。阿蓬德和他的八位亲密的战友被处绞刑,数百名黑人则被鞭笞而死。——译者注

隶制的野蛮镇压。[①]在两个世纪内，起义和远征此伏彼起，为争取古巴自由而洒尽了烈士们的鲜血，在这个斗争中，我们看到古巴的白人和黑人，非洲人，西班牙人，中国人，中南美洲和北美洲人，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理想中团结了起来；由于他们深信仅仅提出革新、改良、正义与自由的和平要求，是无济于事的，因此必须团结起来要求断绝同西班牙的一切联系。

在长期流血的独立革命运动中，产生了两位最富有天才的思想家和唤起民族觉悟的引路人：哲学家和著名教师弗利斯·巴雷拉[②]，自1824年

① 1844年，古巴黑人因不堪忍受西班牙殖民者的压迫，爆发了广泛的起义，一般称为“埃斯卡莱腊起义”或“1844年起义”(la conspiración de La Escalera o de 1844)。殖民统治者为了镇压古巴人民的反抗，曾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大肆捕杀，黑人无辜牺牲者，不计其数。根据当时文献的记载，在起义后第一年，即1845年，古巴黑人的人口已比1841年减少了将近十二万人。(按“埃斯卡莱腊”一词在西班牙语原作“楼梯”解。因当时起义黑人被捕后，西班牙殖民军多将其捆绑在马坦萨斯城附近一所半破败的庄园大厦的扶梯上，进行残酷的拷打。)——译者注

② 弗利斯·巴雷拉(Félix Varela,1788—1853)，古巴早期思想家，是向烦琐哲学挑战的理性主义者。他从1824年起在纽约创办《哈瓦那人》杂志(«El Habanero»)，积极鼓动革命。——译者注

起，他就主张只有以革命的手段脱离宗主国才是争取与巩固自由、正义、文化与文明的民族理想的唯一途径；另一位是何塞·马蒂，他是古巴独立运动的宣传者、旗手、闯将和烈士，同时还是主张共和政体的天才政治家。他不仅指出了通向自由古巴的道路，而且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他在大量的著作中，还给他的同胞留下了教诲、忠言、警告和劝诫，形成了完美的古巴思想宝库，其中包含着共和国必须遵循的最精确的、令人惊赞的政治经济纲领；预见到威胁共和国的一切危险，预示了如果不加提防和避免，可能突然临头的灾祸和容易失足的深渊。

2

1895年9月16日希马瓜尤[①]革命大会曾宣布，——正象古巴第二届全国历史会议所确认的那样——1895年2月24日开始的战争，是1868年

① 希马瓜尤（Jimaguayú），在古巴卡马圭省境内。——译者注

10月10日开始的战争的继续。古巴人民和海外侨民在这两次战争期间，始终保持着潜在的反抗宗主国的革命形势，其表现形式为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运动、起义和暴动；正因如此，解放军代总司令卡利斯多·加西亚·伊尼格斯，在写给1898年西—古美战争中美国部队总司令谢夫特少将的抗议信中（抗议他无视古巴有参与接受在古巴圣地亚哥城西班牙人投降的权利），才授权声明：以这次西班牙的投降而告终的战争是“一场三十年来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斗争”。

3

毫无疑问，三十年战争的第一阶段（1868—1878年），是由古巴的大地主领导的。他们虽然是为了追逐物质利益，保留庄园主和牧畜主享有的特权，才去摧毁殖民制度下对自由享用国家财富的种种障碍，然而他们却表现出一种少见的、独特的和值得称赞的矛盾态度。他们不但具有非常明确的独立理想，而且具有自由、平等和进步的思想与原则；由于这种思想和原则，以及武装斗争本

身的需要，他们宣布废除奴隶制并付诸实行，他们让有色人种和自由奴隶以平等身分加入革命军，其中有些人于战争期间在军政机关中已经升到了很高的职位。

1868年的革命是一个熔炉，组成古巴民族的两大人种在革命中已经熔化在一起。原来划分古巴白人和古巴黑人并使他们处于敌对状态的界线，在革命中已经消失。革命使他们彼此接近、联合并统一在一个民族独立的共同理想中。革命使他们在反抗西班牙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处于平等地位。白种人和黑种人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西班牙。西班牙也是白人和黑人必须共同对它进行誓死斗争的新主人。从那时起，白人和黑人都是西班牙殖民制度的奴隶。必须齐心协力打碎这个枷锁。

1868年的革命，显示了古巴人在完成军事任务方面的才能，这些任务是与在奴隶制下面生活的人民的正常活动截然不同的。在革命中涌现了象戈麦斯、马塞奥、加西亚、阿格拉蒙特这样杰出的战士，他们是在战争中掌握了军事艺术的大师；是与西班牙王牌军的将领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他

们的战略家。在这次战争中，同样也证明了古巴人民的优良品质：大公无私、自我牺牲、克己为人、英雄主义。正如以后在1895年，人们看到的古巴的妇女、老人和小孩，和他们在丛林中起义、战斗和牺牲的父亲、丈夫、兄弟和儿子一道，投身到共同的事业中。这些普通人民，为了全民的事业，为自由的古巴，献出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

与此相反，古巴黑人曾亲身遭受过的、现在古巴的白人也已经看到的，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的专制制度达到了怎样非人道的地步。

但是，无数的古巴殉难者，已经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开出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而西班牙的"义勇队"① 又大大地加深了这条鸿沟。当代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属于保守派的西班牙人安赫尔·奥索里奥② 曾说他们是"一批真正的罪犯集

---

① 这是指由西班牙的小地主、小商人和官僚及其仆人和职员（也是西班牙人）所组成的反动的城市民警队，即所谓"义勇队"。——译者注

② A. Ossorio: «Orígenes próximos de la España actual (De Carlos IV a Franco)», Buenos Aires, 1940, p. 113.（奥索里奥：《现代西班牙的最近起源（从卡洛斯四世到佛朗哥）》，194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版，第113页。）

团，它们受到富有的西班牙爱国者的扶植，他们一贯是使古巴人遭受非法待遇的真正罪犯"；他们制造和策划了千千万万件罪行，包括1871年11月27日枪杀哈瓦那大学医学院八名无辜学生的惨案。

根据霍金·何凡亚尔总督的估计，1868年10月10日在迪马哈瓜[1]开始的解放战争，使西班牙伤亡十四余万人，损失七亿比索。尽管古巴内部存在着分裂，但战争一直继续了十年，并且不是以军事力量，而是以签订和约结束的。这个和约是1878年2月10日，由马丁内斯·坎波斯和古巴解放军的某些将领（而非所有将领）在桑洪[2]签订的。

4

桑洪和约对于古巴和古巴解放事业具有怎样

① 迪马哈瓜(Demajagua)，位于今天古巴奥连特省曼萨尼罗市的南部。1868年，古巴爱国者卡洛斯·塞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曾在他的"迪马哈瓜"制糖厂发动起义，争取古巴的独立。——译者注

② 桑洪(Zanjón)，是古巴卡马圭省西南的一个小地方。从地图上看，它的位置大致在卡马圭市和瓜伊马罗市的中间。——译者注

的意义呢？是不是西班牙胜利而古巴失败了？在1868—1878年的战争中，虽然西班牙的军队在人数上占优势，它拥有从伊比利亚半岛来的正规部队和在古巴招募的“义勇队”和别动队；西班牙的军需品很充足；美国政府不承认古巴解放军为交战的一方；革命者最后处境恶劣；地方主义阻碍了战争向岛国全境蔓延；但是尽管如此，西班牙并未能用军事力量击败革命，而不得不签订和约。

在桑洪并没消灭独立的理想，而是击败了1837年建立起来的专制政权。西班牙在同中央革命委员会[①]签订和约时承认了古巴的地位。在战争期间，革命军曾要求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共和国承认它为交战的一方，都未获结果；而西班牙在与武装起来的古巴人民较量之后，终于在1878年2月10日承认了这点。尽管西班牙已处于垂死阶段，但革命力量仍使它承担了桑洪和约

① 1878年2月8日，“自由古巴”政府中的动摇妥协分子——一部分议员，在圣阿古斯丁·德尔·布腊科召集会议，宣布解散议会，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el Comité Revolucionario del Centro），两日后（2月10日）同西班牙缔结了桑洪和约。但遭到了由安东尼奥·马塞奥领导的奥连特地区起义部队的坚决反对。——译者注

中规定的义务。

革命没有失败，独立的理想更没有被消灭。

这一点，已经为那些公正无私的西班牙历史学家所承认。路易斯·莫罗特在他所著的《战败之道德》[1]一书中，曾断言桑洪和约一例，是西班牙一切内战的典型结局："西班牙的内战都是旷日持久的，平均长达七年至十年。这些战争的结束，都是由于士兵厌战，国内经济资源枯竭或国外援助耗尽，由于劳民伤财，国人厌于支持交战任何一方，双方才协议媾和，或由于叛徒的出卖而告终，而从来不是由于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而结束的"。为了证明这点，他还一一列举多次战争的事实，作出以下结论："从久远的比里亚托[2]时代起，

---

① Luis Morote: «La Moral de la Derrota», Madrid, 1900, p. 45—46. (路易斯·莫罗特：《战败之道德》，1900年马德里版，第45—46页。)

② 比里亚托(Viriato)，原为路西塔尼亚(今之葡萄牙)的一个牧童。罗马人战败迦太基人而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后，横施暴政，比里亚托曾率领乡人英勇抵抗，成为当时路西塔尼亚人和塞尔蒂贝尔人的公认的领袖。他前后转战八年，曾屡败罗马军队。罗马人计穷，因买通其乡人，于纪元前139年将其刺杀于帐幕中。——译者注

到现在的桑洪时代止，没有一次战争是以军事上的胜利结束的"。

尽管西班牙并未履行和约中所规定的各项义务，但是，古巴人除了使西班牙承认了古巴解放革命的地位外，还使它承认了1868年以来在自由古巴地区所宣布的奴隶解放。既然西班牙保证依照和约的规定给予"当时参加起义军的亚洲移民和奴隶以自由"，它也就不得不同意完全废除奴隶制；因为参加起义的黑人和中国人享有自由，而忠于西班牙的黑人和中国人依然处于奴隶地位，这是荒谬绝伦的。所以到1880年2月13日，西班牙不得不颁布一条法令，废除全岛的奴隶制。

因此，古巴有色人种在瓜伊马罗[1]和桑洪所取得的自由以及他们与白人的平等地位，要再次归功于古巴解放者和1866年的革命。

因此，桑洪和约既不是古巴的失败，也不是西班牙的胜利，更不是和平，而是为了恢复1868年在迪马哈瓜发动的那次斗争的一个休战。和约中

---

① 瓜伊马罗(Guáimaro)，位于古巴卡马圭省的东南，靠近奥连特省。1869年4月10日曾在这里宣布古巴第一个共和国宪法。——译者注

规定的革新和改良并没兑现，这就是使古巴的起义运动东山再起的动力。

马塞奥同卡利斯托·加西亚一起，继续从事使古巴脱离西班牙的分离运动。1879年9月5日，马塞奥在金斯顿[①]发出一个宣言，号召古巴人民，海外侨民，上次战争中的同志以及有色人种拿起武器；同时呼吁有良知的西班牙人和富有的古巴人给予同情和支持。在这个争取祖国解放的明确的集体事业中，一位初露锋芒的人物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后来争取古巴自由最伟大的先哲——何塞·马蒂。这一次新的革命运动在古巴历史上被称为"小战争"，[②]这并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历时短暂。但是，这次革命运动却遭到了很多挫折与困难，连马塞奥也未能到达古巴，

---

① 金斯顿(Kingston)，是牙买加的首都。——译者注

② "小战争"(Guerra Chiquita)于1879年8月25日爆发。最初的起义地点是奥连特省的希巴腊、奥尔金及圣地亚哥，后来战争也蔓延至西部各地。但由于事前准备不足、缺乏统一领导，也由于"自治派"的背叛，起义不久便被扑灭(战争于1880年10月10日结束)，前后历时仅一年多。参加起义军的古巴人不多，只有约六千名，但西班牙政府为了扑灭这次起义，却动员了一支包括二万五千名官兵的精锐部队。——译者注

结果以卡利斯多·加西亚将军以及吉列尔莫·蒙卡达、何塞·马塞奥少将和埃米略·努涅斯上校部队的投降而告终。

由于殖民主义者的无能和他们无法纠正的错误，西班牙的统治者和政客们使不满和反抗的情绪日益高涨。无论在古巴或在海外侨民中，起义运动此伏彼起，从未停止。1868年的老战士一次又一次地在古巴岛本土和国外设法恢复武装斗争；其中很多人甚至进行反对宗主国的地下武装活动。

这个自治运动具有明显的分离主义的计划；利用这一运动，给西班牙以沉重的打击，并使古巴人一刻都不忘记，在红黄两色的西班牙国旗之下，要获得自由与正义，改良与革新，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当时自治运动的高级领导人所想的和所说的，是另一回事。

5

反抗和起义在继续着。

在岛国的不同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的处

于潜伏状态，有的却很活跃。为了使革命力量能够推翻西班牙政权，有必要对当时这一革命形势加以统一领导和组织。

这一工作的完成应归功于何塞·马蒂以及他所建立和领导的古巴革命党。

马蒂从十六岁起，就将他的一生完全献给了争取古巴自由和独立的事业。

他的家庭生活、他所受的政治迫害和他的流放生涯，都教育了他，使他认清了西班牙的面目；由于热爱祖国，他在拉丁美洲到处奔走，这使他发现了一些古巴在从殖民地走向独立国家的道路上必须避免或克服的祸害和困难。他在美国的长期逗留，使他知道在古巴武装斗争时期和共和国时期对美国的插手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同时由于他是一位完美无瑕的革命者和杰出的政治家，他从不惊惶失措，也不乏远见，更不鲁莽从事；他懂得挑选适当的和必要的人材；善于克服困难，解决矛盾，消除不和与分歧；他善于不挑起西班牙旅古侨民的仇恨，也不挑起美国人民的仇恨。这种不散播仇恨的斗争，正是马蒂心地善良和胸襟宽大的结果，它给予 1895 年的战争以特有的性质。

与 1868 年的革命完全相反，马蒂现在特别信赖劳动阶级和没有社会保护的人们，信赖佛罗里达古巴侨民中的烟草工人，信赖小资产阶级。他说："我要把我的命运，寄托给地球上的穷人。"他逐渐把人们团结了起来，扫除了通向最终目的地的道路上的障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有偏见和排他主义的倾向。他认为为了革命，要信赖大家；共和国也必须是"依靠大家和为了大家利益的"。

这次酝酿中的战争，是一场全民的战争。参加这次战争的将有 1868 年的爱国志士，以及古巴国内和海外侨民中的新的革命者，他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一个共同的目标紧密团结了起来。

6

马蒂知道，在没有受到殖民政权污泥沾染的古巴海外侨民中，有着古巴人民争取祖国解放的最崇高和最纯洁的感情，也有着将会发展壮大并进行一场坚决革命斗争的火种。

于是他就来到海外侨民中间。但是必须在一

个民族斗争的共同目标之下，把他们团结和组织起来。他把自己的精力完全献给了这一事业。

“同盟会”①成立了，通过了一些基本决议。这些决议后来就成了古巴革命的纲领。从此以后，马蒂夜以继日，不倦地工作着。1893年1月5日，各地古巴侨民的代表在基韦斯特②通过了这些纲领，并于4月10日正式宣布成立古巴革命党。它的目的是：“依靠所有具有善良愿望的人们的共同努力，实现古巴岛的彻底独立，并帮助波多黎各得到解放”；并将根据所有积极的和真诚的参加者的意志，进行一次高尚的、短期的战争，旨在保障岛国居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并履行古巴地理形势所赋予本国的在美洲历史生活中的艰巨责任。它渴望“通过人们充分而积极地发挥自己的真实才能，锻炼出崭新的真正民主的人民，这个人民善于通过真正的劳动秩序和社会力量的平衡，

① “同盟会”的全称是“古巴爱国同盟会”(La Liga Patriótica Cubana)，于1890年1月间在纽约成立。——译者注

② 基韦斯特(Key West，西班牙语作Cayo Hueso)是美国在墨西哥湾中的一个小岛，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南部。它和坦帕等地，都是当时古巴烟草工人集中的地方。——译者注

战胜在一个原来实行奴隶制的社会中，因获得突如其来的自由而可能发生的种种危险。”

必须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为了所有古巴人的荣誉与幸福，是为了把自由的祖国献给全国人民。”

马蒂在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共和国要永远遵循它的原则和理想，这种态度对于一个既热心于进行摆脱西班牙的革命，又热心于建立一个新民族的人，是很自然的。

党代表马蒂①于1892年9月13日，亲自去圣地亚哥·德洛斯·卡巴耶罗斯②访问了1868年独立战争时期的老战士马克西莫·戈麦斯，代表古巴革命党把该党任命他为古巴解放战争新阶段中的解放军总司令的决议交给了他。

马蒂向他解释了古巴革命党在信中任命他为解放军总司令的理由。

---

① 古巴革命党成立以后，马蒂即被海外古巴侨民推选为代表(el Delegado)，负责领导革命工作。——译者注

② 圣地亚哥·德洛斯·卡巴耶罗斯(Santiago de los Caballeros)位于多米尼加中部偏北。从地图上看，它到西面的蒙坦克里斯蒂(Montecristi)和东面的桑切斯(Sanches)，距离相等，并且可以同它们联成一条西北—东南向的直线。——译者注

遴选戈麦斯担任这一职务，是马蒂的革命政治天才最好的证明之一。戈麦斯接受这一任务，则保证了新战争的胜利。因为戈麦斯是伟大十年战争中杰出的战略家，是仍然活着的那些当年的将军们的不可超越的导师，这些将军——安东尼奥·马塞奥和卡利斯多·加西亚——后来在革命发展时期成为副总司令，他们一向尊重戈麦斯的威信，并公认他的才干。马蒂知道，他们同参加过1868年战争的所有其他的军官们一样，只愿尊他为总司令并听从其指挥。马蒂了解，有戈麦斯的统率，战争的发展就会有胜利的保证。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1893年5月27日，马蒂在古巴革命党的机关报《祖国》上，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声明：《革命党对古巴的宣言》。在宣言中，他归纳、发展并明确了解放战争和共和国的理想、目标和计划，阐述了所有具有善良愿望的古巴人，白人和黑人必须参加这一斗争的理由，并谈到共和国对当地善良的、安分守己、不敌视和出卖古巴、不怀有统治和剥削意图的西班牙人所给予的保障。宣言最后说："古巴革命党将为古巴的独立事业做出革命的

贡献。古巴会懂得，在这个可以争得自由的时刻放过机会，就要继续做奴隶。”

7

发动一场进展迅速并夺得最后胜利的全民战争，这一坚定不移的目标，使马蒂在1894年底，组织了一次由三支远征队同时发动的起义，这三支远征队计划由向鲍登先生租来的三只船“拉贡达号”、“阿马蒂斯号”和“巴腊科亚号”携载军火和远征队将领从杰克逊维尔[①]附近的弗南迪纳出发。

这个十分美满的计划，由于一位曾经参加1868年战争的上校费尔南多·罗佩斯·盖腊尔塔的不可饶恕的背叛，由于他难以置信的变节，遭到了失败。

经过周密布置的“弗南迪纳起义计划”的泄露和随后的失败，对于革命理想和革命工作是一个打击。这个打击在当时曾一度使得谋求幸福和使

① 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北部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古巴迅速独立的希望，遮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很快，革命爱国者的心中又重新燃起了信念。他们从挫折中找到了胜利的因素。关于这次筹划中的远征的消息，使原来同情甚至漠视革命的人，对革命组织者的才能有了充分的信任，同时也显示出他们的工作一向做得多么出色，以及这些分离主义计划的实效和规模。善于筹划和组织这种远征的人，肯定是有能力使古巴摆脱西班牙统治的。

工作重新开展起来。一个新的计划正在酝酿和进展中。热情日益高涨。古巴的烟草工人给马蒂以热情的支持和慷慨的捐献。

古巴国内革命运动的组织者，也辛劳地工作着。它的中心人物是胡安·瓜尔维托·戈麦斯，[①]他是古巴起义者同党代表马蒂保持接触的联络人。到处是难于压抑的激昂的情绪。

1895年1月29日，在纽约贡萨洛·德·盖萨达的家里，马蒂、盖萨达同恩里盖·科利亚索和

① 胡安·瓜尔维托·戈麦斯(Juan Gualberto Gómez)，是哈瓦那的著名记者，思想激进，曾得到马蒂的很大信任。——译者注

马亚·罗德里盖斯举行会议，① 一致同意并由后面三人签署了一个新的起义计划："准备在2月下半月（而不提早）发动"。胡安·瓜尔维托·戈麦斯接到了这个指示，及时同各方面取得了联系，确定24日为全岛同时举行起义的日期。

1月31日，马蒂与恩里盖·科利亚索、马亚·罗德里盖斯、曼努埃尔·曼蒂利亚一起，乘"亚索号"汽船离开纽约，以便在圣多明各同马克西莫·戈麦斯会商，共同发表宣言，这就是以签字地点多米尼加一村镇为名而载入史册的蒙坦克里斯蒂宣言。随后这两位革命的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便一齐前往自由古巴的战场。

1895年3月25日，在多米尼加蒙坦克里斯蒂村的一座简陋的小屋中，为领导和协助当前战争（这个战争已于2月24日在古巴全岛爆发）而建立的古巴革命党的代表何塞·马蒂和被解放军全体指战员选为总司令的马克西莫·戈麦斯，"本

① 贡萨洛·德·盖萨达（Gonzalo de Quesada），当时是马蒂的秘书；恩里盖·科利亚索（Enrique Collazo），原是十年战争的战士，当时代表哈瓦那革命爱国力量；马亚·罗德里盖斯（Mayía Rodríguez）则代表马克西莫·戈麦斯将军。——译者注

着他们所承担的共同责任并为了显示古巴革命的统一和牢固的团结"，共同签署了一个纲领性宣言。这个宣言旨在向古巴国内的一切人，向古巴人和西班牙人，白人和黑人，革命的同情者、敌人和旁观者，说明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以及未来的共和国如何产生、组织和发展。

8

1895—1898 年的古巴解放战争，是广大人民的壮举，因为它动员了古巴人口中的绝大部分。当然，这并不是说，这大部分人都紧握着武器走上了战场；但是除了解放军的战斗部队之外，古巴人民的确都把革命作为他们的共同事业，并且参加到革命中去，有的以官兵身分为解放军补充新的力量，有的配合解放军担负各式各样卓有成效的后勤工作；那些城市的、特别是乡村的老百姓，不分男女，也都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援助。还有古巴海外侨民的有力支援，这些侨民，首先是在美国的古巴侨民，在革命进行的整个时期，在经济上给了革命大力的支援。

在“突进战役”[1]胜利结束之后，革命很快地发展到全国范围。蔓延到全岛的六个省份，在每一省内都有战斗发生。甚至在哈瓦那省及京城近郊高官显宦的官邸所在地，解放军也经常威胁着这里的西班牙驻军和它的辅助部队“义勇队”及别动队。

在起义军发动“突进战役”以后，西班牙在古巴的政权已经朝不保夕。西班牙已经完全失去了击败解放军及平定这个岛屿的可能。

克里奥尔农民被强迫集中有力地证明了1895年革命的广泛性。哈瓦那教区的教长，胡安·包蒂斯塔·卡萨斯牧师在他1895年12月所写的、而于1896年初发表的、题为《古巴的分离主义战争，其起因及结束这场战争和防止其它战争的措施》一书中，曾为这种野蛮的集中进行辩护。这

① 1895年10月22日，马克西莫·戈麦斯和安东尼奥·马塞奥开始了第二次独立战争中最出色的“突进战役”(La campaña de La Invasión)。他们率领数量不多、装备不好的解放军，历时三个月，从岛的东端巴腊瓜向西挺进，于1896年1月22日到达岛的西端曼图亚。解放军且战且进，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大部分国土，西班牙殖民军只占有大城市、主要是沿海的大城市。参见本书第一部分第13节。——译者注

一措施，是阿塞尼奥·马丁内斯·坎波斯总督于1895年7月8日给殖民大臣托马斯·卡斯特利亚诺斯的一封检讨镇压独立革命失败的信中提出的，由大臣会议主席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同意并由巴莱里亚诺·魏勒将军接任总督后付诸实施的。他们认为要扑灭独立革命，就必须采取集中营措施，使革命得不到老百姓——居住在高山、平原上茅屋中的男女老幼——的强大支援。因为老百姓为起义军传送消息，提供给养、药品及军火，随时把西班牙军队的行踪和驻扎地点报告给解放军。他们实行集中营措施，还不仅在于隔离那些同情与支援革命的古巴人民，而且还在于用饥饿和瘟疫进行大批屠杀。这就清楚地表明，假如支持革命的只是少数人，那么把他们在城市和乡村中集中起来，就是完全多余的了。

结果怎样呢？

罗马诺内斯伯爵在他所著的《萨加斯塔或政治家》① 一书中，提供了一幅悲惨的图画："在各城

① 见该书第192页。

镇的近郊，有三十多万垂死的集中者，忍受着饥饿和痛苦”。书中还转引了卡纳莱哈斯的一封信中关于这一情景的描述：“牧师和军人，激进派和保守派，都一致认为，战争和集中营，至少已造成了三分之一农村人口的死亡，也就是说，牺牲者在四十万人以上；此外，每天还有更多的被集中者受折磨而死，死亡的数字是可怕的。把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即使战争马上结束，普通百姓、叛乱者、士兵的死亡人数也要在六十万人以上！多么可怕！……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战争，而有一个好的政府，这个美丽的岛屿将是一个多么富有的地方！”

这就是集中营措施的一个可悲的总结。魏勒可以看到他用饥饿和瘟疫消灭古巴人民（只因他们同情革命）的计划正在实现。

但是他却不能阻止古巴人民继续支援解放军。

恰恰相反，集中营措施使古巴对西班牙宗主国的仇恨尖锐到了顶点，越来越多的古巴人起而反抗；它唤醒了那些对革命漠不关心或无动于衷的人；同时也激起了具有崇高感情的西班牙人和美国人民的抗议。

另一方面，那些遭受家破人亡、田园荒芜的农民，除了参加革命充当士兵或者担任其他支援革命的工作之外，别无其他出路。因为要免受饥饿、疫疠和屠杀，只有铤而走险，起来反对宗主国。

古巴革命的这一广泛群众性，已经为许多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所公认，其中立论最突出的有：塞维罗·戈麦斯·努涅斯：《西美战争》；路易斯·莫罗特：《萨加斯塔，梅利亚[1]和古巴》；安东尼奥·马里亚·法维埃：《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弗朗西斯科·皮·伊马格尔发表在《新政权报》上的许多文章。

弗朗西斯科·皮·伊马格尔在他1897年7月3日在《新政权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古巴问题》的文章中说："整个古巴对我们都是敌对的。萨加斯塔和塞尔维拉两位先生当然是这样看的；我们老早也就是这样看的。毫无疑问，在那里，也有站在西班牙一边的人，有的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

[1] 梅利亚（Melilla），是摩洛哥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重要港口，1580年被西班牙占领。摩洛哥独立后，西班牙仍拒绝交还。现在在行政上属于西班牙的玛拉加省，是西班牙的一个重要驻军基地。——译者注

有的是为了党派的仇恨，有的是为了害怕独立。但更多的人，憎恨我们的挥霍无度，甚至超过憎恨我们在那里实行的专制统治。女人对我们的仇恨更甚于男人。假如有一天，马克西莫·戈麦斯凯旋进入哈瓦那，不消说，她们将首先用鲜花欢迎他。"

这位伟大的西班牙共和主义者①的预见，在1899年2月24日，古巴解放军最高统帅率领他的部队进入古巴首都的时候，完全实现了。

虽然我们可以把西班牙著名学者，对1895—1898年解放战争中古巴革命实际情况的述评写上好几页，但我们这里只打算以西班牙皇家学院历史及科学院士和殖民事业的激进批评家巴勃罗·德·阿尔索拉在1897年末写的而于1898年出版的《古巴问题》②一书中所阐述的见解，作为一个

---

① 弗朗西斯科·皮·伊马格尔（Francisco Pi y Margall, 1824—1901），于1869年曾为西班牙立宪派代表，1873年一度出任西班牙总统。1890年创办上述的《新政权报》（El Nuevo Régimen），积极鼓吹共和政治，主张古巴自治，并支持左派政见。他一生著述很多。——译者注

② Pablo de Alzola: «El problema cubano», Bilbao, 1898, p. 41—42.（巴勃罗·德·阿尔索拉：《古巴问题》，1898年毕尔巴鄂版，第41—42页。）

概括。“总而言之，一个自认为文明先进的宗主国，要对一个地理气候十分恶劣，距离遥远，而几乎到处布满张牙舞爪的敌人，且惯于打埋伏战的殖民地进行长期统治，这是西班牙军队力所难及的，甚至也不是国力强盛、军事组织严密、行政管理完善的国家的军队所能应付得了的。”

总司令马克西莫·戈麦斯的副官米盖尔·巴罗纳·盖雷罗，在他的一部文献丰富、立论公正的著作《古巴独立战争》[1]中，在缺乏古巴和西班牙统计数字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非常接近的估计数字”，这是“以某些书而材料（例如总督马尔图在奥连特省所作关于反抗西班牙的人口调查）和具有一定价值的经验判断为根据的”。它可使我们看出当时革命的广泛群众性。参加伟大的独立运动“反抗西班牙的人口”高达三十四万二千九百九十二人；其中解放军现役军人三万人；后备新兵二万五千人；后勤人员五千人；古巴革命侨民五万人；被放逐或被驱逐出境的政治犯二千人；监狱和要

① Miguel Varona Guerrero: «La Guerra de Independencia de Cuba», t. III, p. 1813—1817.（米盖尔·巴罗纳·盖雷罗：《古巴独立战争》，第3卷，第1813—1817页。）

塞中的犯人二千人；被西班牙虐待致死者一万五千人；在西班牙占领区因革命而被判死罪者一百人；被西班牙公开枪决的古巴人一百九十二人；革命地区由于天花、疟疾和其他传染病而死亡者二万人；由海外来到古巴的远征队一千七百人；在战争中被西班牙军队杀害的解放军和革命后勤人员一万二千人；居住在革命地区的以及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农民和他们的家属十八万人。

9

我们已经指出，海外的古巴侨民，特别是侨居美国的古巴人，都积极参加了古巴人民支援1895—1898年解放革命的群众运动，这表明他们虽然远离祖国，但他们的爱国热情始终是旺盛的，他们和岛上的同胞同仇敌忾，一起为古巴的独立而斗争。有必要指出，许多在美国的古巴侨民，长期以来经济生活是比较安定的，并且享有自由、民主的气氛。正如1899年，当西班牙统治垮台的时候，他们中间很多人继续留在美国，这一事实就可以证明。这说明了推动他们支援革命的，并

不是直接的个人利益。

在十年战争、“小战争”以及由卡洛斯·阿圭罗、腊蒙·莱奥卡迪奥·博纳切阿、戈麦斯-马塞奥、林巴诺·桑切斯、费尔南德斯·鲁斯分别领导的历次失败的起义中，古巴侨民始终是热心参加，踊跃捐献，坚决支持以古巴独立为其理想和目标的整个解放事业。

多明戈·门德斯·卡波特在《桑洪和约》一书中说，侨民们“从未放弃过这一理想，始终保持着最纯正的爱国主义，心中永远怀念着古巴。”①

索萨在他的《“突进”战争史文集》中，也作了非常公正的评价：“由于优秀的古巴侨民高涨旺盛的爱国主义热情，古巴革命党的经费是源源不绝的。”经费主要来自“基韦斯特、坦帕、奥卡拉、纽约等地的烟草工人。他们每日或每周自愿拿出百分之十的工资做为捐献，而且从不拖欠或少付。”②

---

① Domingo Méndez Capote, «El Pacto del Zanjón», La Habana 1929, p. 47.（多明戈·门德斯·卡波特：《桑洪和约》，1929年哈瓦那版，第47页。）

② Benigno Souza, «Ensayo histórico sobre La Invasión», p. 91.（贝尼诺·索萨：《“突进”战争史文集》，第91页。）

这些侨民们建立了许多俱乐部，旨在进行革命宣传和募集为购置军火、药品及满足其他战争需要所需的基金。巴罗纳·盖雷罗，在他的《古巴独立战争》一书中，详细列述了这些俱乐部的数目：在纽约，超过十三个；在费拉德尔菲亚，五个；在西坦帕，十一个；在坦帕，三十一个；在基韦斯特，三十四个；在坦帕港，八个；在特哈斯，四个。[1]

此外，在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委内瑞拉和萨尔瓦多，也有这种具有同样目的的俱乐部。

在1897年9—10月间在雅雅[2]召开的制宪会议，根据执政委员会和美国代表团提出的报告所作的声明中，对古巴侨民特别是旅美古侨这种群众性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同仇敌忾和经济支援，做了最有力的证明，声明说："已经获得的收入和将来可能获得的收入最可靠的来源，是我们侨民中穷苦阶级自愿拿出的百分之十的捐献。"为审查外交部长的备忘录而组成的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的意见，同恩里盖·科利亚索代表在委员会上

① 见前书，第1卷，第404—429页。

② 雅雅(Yaya)，是奥连特省北部的一个小镇。——译者注

的个人发言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这显示了最后一次解放战争鲜明而深刻的人民性。“一件明显的事实引起人们的注意：当穷苦阶级继续按时缴纳百分之十捐款的时候，有钱人却无动于衷，甚至连已经打算发行的公债也不认购”。

可见，对古巴解放事业的先哲和被压迫人们的救星[1]的号召，热烈响应的是地球上的穷人。

10

在古巴三十年解放战争期间的两个重要阶段——1868至1878年和1895至1898年，西班牙多数官员、政客、军人和记者，经常用侮辱和蔑视作为主要手段，来贬低古巴革命者的威望，特别是在报告双方部队发生冲突和战斗的时候。

这些古巴革命者经常被说成是“叛乱者”、“阔佬”、“强盗”、“无赖”、“坏蛋”和“胆小鬼”，甚而至于还把这些污辱的话编成小调，让西班牙的顽固派和亲西班牙的克里奥尔人哼唧。

① 这是指何塞·马蒂。——译者注

西班牙的每一份战报都是在说明“叛党”的人数大大超过西班牙军队之后，说前者伤亡很大，而“我们没有什么损失”，顶多是一、二名士兵受伤和一头驴子丧命，并在最后说：“叛军胆怯地逃跑了”。

西班牙的军事头子们，为了替他们无力镇压革命进行辩解，愤愤地抱怨古巴独立革命者不打正规战，说他们神出鬼没，经常在对西班牙军队进行骚扰之后，立即消失。

解放军在1868年和1895年战争中所运用的战略和战术这一重大问题是这种诽谤性的攻击永远掩盖不了的。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前一次战争并不是以西班牙军队的胜利告终，而是以一纸和约来结束的，事实上这只是一次休战；而在第二次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解放军的强大力量始终是不可战胜的，而卡列哈、马丁内斯·坎波斯、魏勒和布兰柯这些将军们却遭到了惨败，始终没有达到挫败或削弱解放革命的目的。这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正是解放军所运用的战略战术。

事情恰恰相反，这些自由的战士，绝不是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没有领导、胆小懦怯、不敢露面、看见敌人就跑的“叛乱分子”和“匪徒”。正如一些

古巴历史学家如贝尼诺·索萨在《马克西莫·戈麦斯大元帅》、《一个独立革命团的历史》和《“突进”战争史文集》等书中，以及米盖尔·巴罗纳·盖雷罗在《古巴独立战争》一书中，所完全证明的，也为许多欧洲的包括西班牙、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历史学家和军事评论家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的确，——索萨说——有一个最良好、最巧妙、最适合他们的人力和装备情况的军事组织，它的特点是能够因地制宜地攻击敌人；他们有着根据自己有限的枪枝弹药巧妙地利用当地地形的特殊才能；他们为了能够抵抗敌人，还有着适应一切环境的本领”。①

当然，除了象卡利斯多·加西亚那样极少数的人例外，他们大都未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没有统一的军事装备，没有足够的给养和充足的弹药。但是他们用热情与信心，用鼓舞着连队全体成员——士兵和军官争取自由理想的信念，用日常

① B. Souza: «Biografía de un regimiento mambí; el regimiento Calixto García», La Habana 1939, p. 9—10.（贝尼诺·索萨：《一个独立革命团的历史；卡利斯多·加西亚团》，1939年哈瓦那版，第9—10页。）

行动中放射出英雄主义光辉的果敢精神，用马蒂在密谋起义期间谆谆告诫而在战争中坚决执行（对极个别的违犯情况严加惩办）的人道原则——这种人道原则和西班牙官吏、正规军、"义勇队"和别动队的残暴恰成鲜明对照——，用最高级将领、军官和士兵在十年战争和1895—1898年战争的战场上所获得的实际经验，用所有这一切，弥补了他们在军事上的严重不足。

贝尼诺·索萨曾强调指出，1868年的战争，对于我们的解放战士，是一次多么出色的锻炼，使他们学会利用自然界和气候所提供的有利因素，使他们学会打游击战。在1868年那次战争中，"一切都是无计划的仓促行动，摸索，艰苦的学习，痛心的错误……。而在2月24日的那次战争[①]中，在这天起义的古巴人却有数百名最有才干的、精通古巴战争的老战士的指挥，他们都是从'小战争'和伟大的十年独立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而且不久，又有另外数百名古巴革命军官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军官都是被流放而飘泊异地的。他

① 1895—1898年的解放战争于1895年2月24日发动，故云。见本书第9页。——译者注

们一心等待着远征船只把他们带回祖国，与正在起义的同胞共同进行斗争”。①

美国西克尔斯将军在一篇高度赞扬“突进战争”的军事评论中，再次肯定了这种战术的成功。索萨引述他的话说：“西班牙的军事将领和他们的辩护士对于起义军不摆开阵势打仗曾提出许多责难。这就是说：古巴将军们不愿在西班牙人所选定的地点作战。他们总是在形势有利时能打才打。绝不打对敌人有利的仗。”②

正象索萨在他的《“突进”战争史文集》中着重描述的那样，总司令马克西莫·戈麦斯将军经过1868年战争中的历次战役，不仅比任何人都更熟悉岛屿的地形特点，而且深知西班牙将军们的心理。

索萨说，1897年2月3日，戈麦斯给何塞·德·赫苏斯·蒙特亚古多的指示，就是古巴革命军战略与战术的一个很好说明：“进入顽强战斗的时刻已经到了，您知道这该怎样做。不要让士兵

① 贝尼诺·索萨：《“突进”战争史文集》，第22—23页。

② 贝尼诺·索萨：《马克西莫·戈麦斯大元帅》，1936年哈瓦那版，第185页。

去硬拚。要设法以步兵打伏击。要保护马匹，利用夜间（夜战）巩固阵地。白天打狙击，夜间进行偷袭。这样，你用二十人就可以毫无危险地打击一支千人纵队，晚上不让他们睡觉（睡眠可以恢复力量），到第二天这些士兵就会疲惫不堪，您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捉住……”

对于这些有关解放军战略战术的宝贵资料，索萨又作了补充。他说明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戈麦斯，曾怎样从足以致人死命的、比革命者的子弹和砍刀还要厉害的热带气候中，找到了最好的助手……戈麦斯说过，“我的三位最出色的将军是谁？就是6月、7月和8月”。热带气候和它的伴友——黄热病、疟疾、痢疾及其他疾病，给西班牙军队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因此，1897年萨加斯塔说：“我们为古巴战争所付出的代价是，每天有一百个士兵丧命”。索萨还引述了戈麦斯在夜间向安营的军官们告别时常说的一句话：“又过了一天，先生们，又打了一个胜仗”，以及戈麦斯在1898年3月14日的日记上写的话：“驻扎在那里的还是那几个营，名字也没有变，但是飘动着的旗帜好象变了，颜色变了，也许是由于用久了的缘

故。虽然事实上，是热带的太阳使在欧洲染制的旗帜褪了色”。

古巴解放军的一位将军和古巴最早的军事评论家之一恩里盖·科利亚索说的话充分地表达了真理，是对戈麦斯最正确的评价。他说，马克西莫·戈麦斯本人“弥补了一切不足，使古巴取得胜利，他终于看到他所争取的古巴独立的事业得到实现。”①

11

正是由于古巴解放军在1895—1898年整个战争中所发展的独特的战略战术，才使卡诺瓦斯和萨加斯塔所追求的、妄想以武力摧毁解放革命的图谋成了泡影；并使卡列哈、马丁内斯·坎波斯、魏勒和布兰柯为了同一目的而制定的军事计划，彻底破产。这一战略战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卡列哈、坎波斯和魏勒所统率的西班牙皇家军队在军事上的失败，因而不得

① 贝尼诺·索萨在《马克西莫·戈麦斯和1875年及1895年的“突进”战争》一书中的引文，1932年哈瓦那版，第13页。

不实行自治，同时西班牙的统治者、政客、军人和历史学家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一痛苦的现实。

在这里不可能引述全部证据，我们只介绍其中的一些。

弗朗西斯科·皮·伊马格尔，1898年2月12日在他所编《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的《古巴问题》一文中说："我们没有能够用二十万人打败他们；因为他们是那里的主人，他们熟悉作战地区的地形，还有气候的帮忙，而且他们是为独立而战。有一个理想在推动和鼓舞他们，而我们却一无所有。我们的士兵是被迫到那里去的，既不是出于热情，也不是出于荣誉感。"

加夫列尔·毛腊·加马索，在他的《关于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在太后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德·奥斯特利亚摄政时期的统治的史评》一书中供认："造反的古巴人，除了少数例外，绝大部分属于西班牙血统，不论当时还是过去，都证明他们对于游击战争具有这个民族天赋的杰出才能。而正规军则大部分由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十九岁至二十一岁的青年所组成，他们在那里作战，既不了解当地情况，又不能适应当地的气候，还有各种各样不利的

条件；他们唯一所仗恃的只是勇敢，在最容易显示勇敢的孤身作战中，他们个人的真正英雄主义的品质往往会加倍地表现出来……那些叛乱者，对于几乎总是盲目地追踪他们的正规军主力所走的路线和兵力的大小，经常了如指掌。他们常常根据形势的利弊——至少是根据推测作出的判断——，决定打还是不打。那些忠心耿耿的、强大的、装备精良的部队，在叛乱地区耀武扬威地然而毫无效果地开来开去；但与此同时，小部队则遭到优势兵力的袭击，被迫进行最仓促的战斗，而且往往是打败仗。除非碰运气，否则西班牙人不可能获得真正重大的胜利。"①

最后，请看一看贝尼诺·索萨在他的《马克西莫·戈麦斯大元帅》② 一书中收录和发表的，那些

---

① Gabriel Maura Gamazo: «Historia critica del reinado de D. Alfonso XIII durante su menoridad bajo la regencia de su madre doña Maria Cristina de Austria», t. I, p. 235—236. (加夫列尔·毛腊·加马索：《关于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在太后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德·奥斯特利亚摄政时期的统治的史评》，第1卷，第235—236页。)

② 贝尼诺·索萨：《马克西莫·戈麦斯大元帅》，第61—81页。

曾经参加过1868—1878年和1895—1898年两次战争的西班牙军官们所提供的有力证据吧，这些证据显示了解放军以他们独特的战略和战术所赢得的成就。

关于拉萨克腊战役，①西班牙将军西门尼斯·卡斯特利亚诺斯在他的《古巴战役的军事研究》一书中，写道："经过这次战役，以及前几次的失利……过去的猛打猛冲一变而为过分的谨慎，几个月之前，一见敌人就轻率地猛扑上去；这次战役以后，一看见几个侦察兵的影子，各营立即列成纵队。这样西班牙的军队过分密集，敌人的射击很难落空……叛乱者的骑兵作几下冲锋的样子，我们的步兵立即排成密集的队形，然后敌人分股进攻，人与人之间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向我们的队列射击，造成很大伤亡……敌人的轻骑兵，可以同最好的骑兵相媲美。"

关于这一战役，巴里奥斯少校评论说："我们放弃了散开的队形，古巴人凭他们锐敏的直觉，立

① 拉萨克腊（La Sacra），是卡马圭省西南部的一个小地方，介于纳哈萨河（Najasa）和塞维利亚河（Savillà）之间。——译者注

即看出如何利用我们的弱点占到便宜。”

“闪电”营营长坎波斯·伊费留少校，在谈到纳兰霍战斗时说：“打了一阵密集的炮火，敌人的骑兵轻捷而勇敢地连续冲锋了几次，被我军炮火打退之后，该我们的骑兵出动了。由路易斯·波特罗上校率领的皮萨罗骑兵队立即行动……刹那间他们就不见了……我们隐约地听到低沉而阴森的军号声……占据有利地形的敌军步兵的炮火和向我们的骑兵队进行猛烈冲锋的敌军骑兵，打乱了我军骑兵的队形，迫使它们仓皇撤退，躲到我们列成战斗队形的步兵后面去。”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西尔维斯特莱·斯柯维尔，在1895年12月22日报道他亲身参加的那次“突进”战役的情况时说：“戈麦斯，事实上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他从圣克拉拉南部的一个地方出发，进入马坦萨斯省，同时用部分兵力，插入科伦[①]打退直接由坎波斯指挥的西班牙军队，随后向西北方向撤退，而它的主力部队一面烧毁火车站，一面在规定时间完成行军任务。如

① 科伦(Colón)，位于马坦萨斯省东南部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果戈麦斯的这次进军今后被详细报道出来，军界人士肯定会认为，这在突破敌人的防线方面，是一次最勇敢的壮举。”

1896年1月14日《太阳报》评论说：“如果有人说，这次进军(“突进战役”)大胆得荒唐可笑，那末，这种说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结果证明，它并不荒唐可笑……这位革命领袖的这种战略天才是任何战争中从未有人超过的。……与其说它是当代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不如说更近似于神话中的奇迹。戈麦斯在整个战役中表现出惊人的军事天才。”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老战士西克尔斯将军说：“戈麦斯由东部到西部的进军，从军事观点来看，同谢尔曼的进军同样著名；当然，把西班牙人的指挥说成无能是不客气的，但是即使承认确实是如此的话，我们也应当把戈麦斯和马塞奥列入第一流军事专家的行列。”

伦敦《泰晤士报》说：“西班牙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和叛乱分子是四与一之比，但却无法阻止戈麦斯和马塞奥领导的叛军经常不断的胜利，他们时而分散，时而集中，纵横全岛，而未遭到一次真正

象样的失败。从这时起，西班牙人的作战可算已经失败了。”

西班牙著名记者和军事评论家贡萨洛·德·雷帕腊斯，在《马德里先驱报》发表文章说：“不幸的是，戈麦斯的公告和政府的公告有这样一个不同：前者是准时兑现了的，后者则从未兑现。因此迄今为止，战略上的胜利是属于戈麦斯的，谁要隐瞒这一点，是最愚蠢的。”

12

解放军取得胜利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总司令马克西莫·戈麦斯所采取的并在整个战争期间贯彻执行的一项决定，即彻底破坏生产和财富的来源，破坏岛上的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特别是糖业生产。根据他 1895 年 7 月 1 日颁布的通告，坚决禁止农产品和肉类流入敌占区，下令停止甘蔗种植园的工作，纵火烧毁甘蔗田，破坏那些企图榨糖的工厂，这样可以使西班牙政府失去制糖工业提供的大笔收入，这笔收入一向被用来养活岛上那些镇压古巴革命的西班牙军队和别动

队的。

由于岛上经济活动的瘫痪，特别是制糖业的瘫痪，使得那些有钱有势、对官方经常起决定性影响的人物转而对西班牙政府在古巴的统治手段感到不满，同时更清楚地显示了革命力量的强大和西班牙统治者及军队的无能：既没有力量摧毁革命，也没有力量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

13

当1895年2月24日解放战争重新开始的时候，正值萨加斯塔在西班牙当政。卡列哈将军是派驻古巴的总督。

25日，殖民大臣阿瓦苏萨轻蔑地把古巴解放者说成是“强盗”，把革命说成是“强盗行为”。28日当政府在参议院受到质问时，据奥尔特加·鲁维奥的记载，萨加斯塔曾狂妄地表示，“这种企图是一次疯狂的冒险行为，由于没有舆论的支持注定要失败，肇事者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对于蓄意破坏我们亲爱祖国领土完整的人，法律是铁面无情的”。

“强盗行为”也好，“疯狂的冒险”也好，都未妨碍西班牙政府在卡列哈没有请求的情况下就准备给他增派六千人，加强岛上的驻军，根据奥尔特加·鲁维奥统计，那里原有一万三千六百六十一名士兵和九百一十六名军官。

西尔维拉和罗梅罗·罗夫莱多①两人的确看到了情况的严重性，因而罗梅罗在3月1日请求立即派遣两万名士兵。马丁内斯·坎波斯认为，“只要宣布部队离开西班牙的消息，就会大大挫伤叛乱者的士气。”

西班牙政府终于认识到“革命运动的严重性”，因此在3月3日的大臣会议上，决定派“梅塞德斯皇后号”巡洋舰和八千五百名士兵开赴古巴，随后又增派一千五百人并答应卡列哈再给他一万人。

正象奥尔特加·鲁维奥②所说，“由于萨加斯

① 罗梅罗·罗夫莱多（Romero Robledo），是当时西班牙政府的部长，也是古巴甘蔗田的大领主之一。——译者注

② J. Ortega Rubio: «Historia de la Regencia de María Cristina Habsbourg-Lorena», Madrid, 1905, t. II, p. 303.（奥尔特加·鲁维奥：《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摄政史》，1905年马德里版，第2卷，第303页。）

塔政府和驻古巴的卡列哈将军执行的笨拙的政策，危机的发生是自然的。”3月23日，保守党代替了自由党，卡诺瓦斯接替了萨加斯塔。西班牙军队的王牌将军、君主制的复辟者、古巴绥靖政策的执行者马丁内斯·坎波斯，在28日被任命接替卡列哈的职务。卡列哈曾为自己的失败辩解说："我没有足够的兵力防止叛乱，更说不上平定叛乱了”。奥尔特加·鲁维奥评述这番话时说，“在卡列哈执政期间，政治和行政管理是一团糟”。

对马丁内斯·坎波斯的希望，很快就消失了。

毛腊·加马索[①]曾强调指出1895年6月间双方兵力是不成比例的——古巴革命者只有六千至八千人，而马丁内斯为镇压他们却拥有五万二千人，另外还有十九艘军舰，其中超过千吨的有六艘："桑切斯·巴卡斯特吉号”、“豪尔赫·胡安号”、“茵方塔·伊沙贝尔·科伦号”、“贝纳迪多伯爵号”和“伊沙贝尔第二号”。

当时的军事力量如下：

将军	20人

① 加夫列尔·毛腊·加马索：《关于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在太后克里斯蒂娜摄政时期的统治的史评》，第1卷，第235页。

高级军官	228 人
军官	1,845 人
部队——	
步兵	39,885 人
骑兵	2,596 人
炮兵	671 人
工程兵	414 人
公安部队	976 人
宪兵队	4,400 人
海军陆战队	2,700 人
“义勇队”	1,152 人

这位西班牙历史学家评论说，“这样的绝对优势，仍然是不足的”。

据奥尔特加·鲁维奥估计，当1895年3月22日戈麦斯和马塞奥从巴腊瓜平原发动从东到西的“突进战役”的胜利进军时，在古巴的西班牙军队全部兵种已增加到约八万人。[①] 但是毛腊·加马索把这个数字提高到十万人以上，他评论说，“断言到春天就能平定叛乱，纯粹是瞎吹。正如设想

① 奥尔特加·鲁维奥：上引著作，第1卷，第242页。

西班牙人总是按照四与一的比例作战，是纸上谈兵的战略家的诡辩或无知一样”，他说，当时马克西莫·戈麦斯手下并没有二万五千人。①

当“突进战役”正在发展，解放军正在胜利地横扫全岛，使各省都武装起来反对西班牙并于1月22日到达岛国西端的曼图亚的时候，西班牙的军队一直源源不断地开往古巴。安东尼奥·马里亚·法维埃在他写的《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的传记》中说，“在1895年12月21日，西班牙在古巴拥有一支十一万三千人的兵种齐全的军队；然而，战争却比开始时打得更糟，当时全军士气异常低落”。② 奥尔特加·鲁维奥详细描述说，“到这一年最后一个月，派往古巴的军队共有十一万二千人；另外还有五万多名‘义勇队’，其中有五千至六千名别动队”。③

马丁内斯·坎波斯在承认他的失败之后，曾

---

① 毛腊·加马索：上引著作，第1卷，第242页。

② A. M. Fabié: «Cánovas del Castillo» Barcelona, 1928, p. 328.（安东尼奥·马里亚·法维埃：《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1928年巴塞罗纳版，第328页。）

③ 奥尔特加·鲁维奥：上引著作，第2卷，第375页。

向卡诺瓦斯推荐魏勒，说他有能力进行残暴的战争，有集中和屠杀农民的本领。

于是魏勒被任命为古巴的总督，1896年1月19日，摄政王后批准了这项任命，这也就意味着将派遣更多的军队去古巴。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读者在后面将会详细地看到这一点。

西班牙大臣会议主席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公开地、不遗余力地支持魏勒去完成他镇压古巴解放革命的艰巨任务。

可以说，当时在美洲，没有一个军事将领，象这位坦奈里弗侯爵[①]那样，手下拥有那么多的兵员和军事装备。这位侯爵在《我在古巴的统治》[②]中，承认卡诺瓦斯使他看到，他的任命是由于“舆论要我担任这个职务”，卡诺瓦斯“任命了一批我认为需要的将军陪我前往，其中有巴尔赫斯·阿乌马达和奥查恩多中将，”还有“一批我认为必不

---

① 这是魏勒的封爵称号。坦奈里弗(Tenerife)是西班牙所属卡那列亚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译者注

② 见本书作者著《魏勒在古巴——法西斯暴政的一个先驱者》一书，1947年哈瓦那版，第7、8章，第47—52、53—64页。

可少的文职人员。”他被授予全权制定未来的作战计划：“关于作战计划，我没有接到过任何指示。”他说，他了解革命的强大力量的实际情况：“叛乱已经从岛国的一端蔓延到另一端。”当他经过卡迪斯，[1] 对人们的欢呼致答词时说，“我不得不表示，我打算在二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结束战争。”2月11日他在哈瓦那登陆时，对古巴居民说：“我带来了结束战争的光荣使命。”

早已决定派给马丁内斯·坎波斯的军队，一部分随同魏勒到达古巴，其余部分是在魏勒到达古巴后派去的。其中有一批二万一千四百六十三人，是根据当年1月20日国王的命令派遣的。

魏勒到古巴后，发现“岛上局势极端严重，我承认在踏上这个岛屿之前，这种情况是我未曾想到的”。他宣布他决心进行一场无情的战争：“必须认识到，事态的发展要求我采取决不妥协的严厉措施；这是善良的西班牙人所要求的，也是我必须全力以赴的。”

魏勒并没说出在他统率时期他所拥有的军队

[1] 卡迪斯(Cádiz)，位于西班牙西南角，面临大西洋，傍卡迪斯湾，是西班牙的重要海港之一。——译者注

的总人数，但是他引用了自由党头子萨加斯塔在1897年5月19日在国会开会之前与追随他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们集会时所讲的一番话："在我们派出了二十万人和流了这么多血之后，在这个岛屿上，除了我们的士兵脚下踩着的士地以外，再没有一块土地是属于我们的。"魏勒只是说，"由于我对萨加斯塔一向抱有尊敬"，我对出于激动而讲出的这种错误的话，不想作任何评论。

根据西班牙历史学家所提供的情况，我们可以算出派给魏勒的并在其指挥下的军队的总人数。

据胡安·奥尔特加·鲁维奥[①]说，8月1日"卡诺瓦斯宣称，9月间将派一支四万人的远征队，11月间再派一支二万人的远征队，开赴古巴。"这位历史学家说，10月21日在王后主持的大臣会议上，"卡诺瓦斯曾说，除了魏勒已统辖的二十万人外，政府打算在年底以前再给他增派一支二万五千人的远征队。"

魏勒在《我在古巴的统治》一书中说，"在我管辖期间这个岛上拥有的军舰情况如下：一艘装甲

① 奥尔特加·鲁维奥：上引著作，第3卷，第62、70页。

巡洋舰，五艘一级非装甲巡洋舰，二艘三级非装甲巡洋舰，三艘一级炮舰，七艘二级炮舰，二十四艘三级炮舰，六艘鱼雷炮舰，六艘登陆艇，二艘渡船，二艘拖船和一艘运输舰。”

魏勒最后在《我在古巴的统治》① 中，发表了“1895年拥有医院和医疗站”的数字。共有三十三所医院，二万一千六百张病床。

1896年和1897年创办了三十八所医院和医疗站，共有二万张病床。

总起来，共有七十一所医院和医疗站，四万一千六百张病床。

正象贝尼诺·索萨博士在他的《马克西莫·戈麦斯大元帅》② 一书中所证实的那样，魏勒是历史上为了进行统治拥有士兵最多的一位西班牙将军，他所统率的士兵比“大将军③”多二十倍，比埃

---

① V. Weyler: «Mi mando en Cuba», t. V, p. 125—126.（魏勒：《我在古巴的统治》，第5卷，第125—126页。）

② 见该书第191页。

③ 大将军（el Gran Capitán）是西班牙著名军事家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Fernández de Córdoba）的别名。十五世纪末叶曾率领西班牙军队在那不勒斯（Nápoles）打败法国的军队，确保了西班牙对那不勒斯的统治。——译者注

尔南·科尔特斯[①]多无数倍，他非但没有征服意大利和墨西哥，而且率领着，确切地说，是驱使着二十六万士兵，甚至也没能征服由西班牙南部的伟大冒险者唯一的后裔带领一小批人所守卫的圣克蒂斯皮里图斯[②]地区的"革新牧场"[③]。

除上述关于卡列哈、马丁内斯·坎波斯和魏勒将军的部队人数的统计资料外，我们现在再提供由古巴革新党驻马德里代表阿图罗·安勃拉尔德在他的《殖民札记》[④]中所发表的资料，这些资

---

① 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原是西班牙一个军官。1519—1522年，以血腥的手段曾从古巴出发征服墨西哥。——译者注

② 圣克蒂斯皮里图斯（Sancti Spiritus），是古巴最大的烟草产地，烟草年产量达到一千万磅。它位于拉斯维利亚斯省的西南部。——译者注

③ "革新牧场"（El Potrero de La Reforma），是戈麦斯的大本营所在地。魏勒当时曾在拉斯维利亚斯集中五万以上精锐部队，企图包围戈麦斯的军队并一鼓消灭之。古巴解放军官兵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敢，以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不断给予西班牙殖民军以沉重的打击，最后终于大败魏勒军队，因此这一战役实际上成了魏勒的"滑铁卢"。——译者注

④ Arturo Amblard: «Notas coloniales», Madrid, 1904, p. 159—164.（阿图罗·安勃拉尔德：《殖民札记》，1904年马德里版，第159—164页。）

料取自赫纳罗·阿拉斯摘引官方统计发表在1897年1月27日的《西班牙通讯》上的数字。

“1895年3月8日到1896年11月30日，根据横渡大西洋登陆的情况，派往古巴的士兵是十七万五千三百零一人，加上1895年2月前已在岛上的士兵十七万人，总数达十九万二千三百零一人。”

由于赫纳罗·阿拉斯在1897年1月27日的《西班牙通讯》中所提供的统计，据他本人说，只到1896年年底为止，所以阿图罗·安勃拉尔德在他的《殖民札记》中作了下面的补充：在阿拉斯先生所统计的日期之后，西班牙在古巴的军队仍继续不断增加，到1897年，全年都保持着最庞大的兵员。根据权威方面的材料，在这一年的各个月份，其人数可以分别确定如下：

一月份	215,155 人
二月份	218,068 人
三月份	218,100 人
四月份	218,126 人
五月份	218,764 人
六月份	215,370 人
七月份	211,976 人

八月份	208,781 人
九月份	205,388 人
十月份	203,939 人
十一月份	200,450 人
十二月份	200,450 人

“在上列数字中，均不包括‘义勇队’的人数，也不包括由私人资助的制糖厂的护卫队的人数。关于护卫队，我们没有确切的数字；至于前者，他们在全岛的分布情况如下：

哈瓦那市	20,134 人
哈瓦那省其他地区	8,492 人
比那尔德里奥	12,163 人
马坦萨斯	11,316 人
圣克拉拉	20,682 人
波多普临西佩	1,867 人
古巴的圣地亚哥[1]	9,889 人
共计	84,543 人

[1] 西班牙人把古巴划分为六个省，在推翻西班牙统治以后，该区划仍然保留下来。不过，圣地亚哥省、波多普临西佩省、圣克拉拉省已分别改为奥连特省、卡马圭省、拉斯维利亚斯省。——译者注

也就是说，总共有八万四千五百四十三名士兵，另有高级军官四百一十六人和军官五千二百五十五人。

“可以看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为宗主国效劳的武装部队的总人数，在三十万到三十五万之间；但是还需加上相应的医务人员数字：十八万至二十万。

“这一情况的确是使人吃惊的。要不是我们对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有绝对把握，我们对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幅极悲惨的图景，几乎是难以置信的。”

14

古巴三十年解放战争最后阶段最重大而又不为人们所了解的问题之一，是西班牙兵源枯竭的情况。西班牙两个政党的头子——卡诺瓦斯和萨加斯塔——曾叫嚷说，西班牙为反对古巴独立革命决心战到“最后一人”。事实上，这种情况早在美国参战之前已经发生了。

下面我们将列举一些关于当时西班牙军队伤

亡人数的统计，以说明仅仅由于患病、死亡和遣送回国，卡诺瓦斯派给马丁内斯·坎波斯，尤其是派给魏勒的大批兵员，实际上已减少了一半以上。

据军医总监拉腊·塞莱索先生说（见阿图罗·安勃拉尔德的引文），从1895年3月到1897年第一季度西班牙国库所支付的医疗费用，高达五百七十六万六千七百九十二法郎。

贝尼诺·索萨博士在他的《马克西莫·戈麦斯大元帅》一书中，提供了上述西班牙军医在1899年在伦敦医学刊物《刺血针》（The Lancet）上发表过的一些数字：

"在第一年的前十个月战争中，在1896年全年和1897年的上半年，西班牙军队中的病员如下：

1895年（十个月）……… 49,000名
1896年 …………………232,000名
1897年（上半年）………201,000名

"在1896年和1897年上半年，仅患疟疾的士兵就有七万九千五百人，在五百名军医中，有五十名死于黄热病。到1898年1月1日，布兰柯将军不得不在他的医院中为病员设置四万五千张病

床，这等于当时在古巴的西班牙军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索萨评述说：“除这位西班牙医生所说的二十万病员外，在这年的下半年——雨季（三“将军”的季节）——至少又有同样多的病号，也就是说，1897年全年进医院就医的人数共有四十万人。平均在一年之内，每个西班牙士兵要进医院三、四次。”

根据西班牙的统计资料，索萨得出这样的结论：“西班牙政府的二十多万作战部队到1898年因死伤和因慢性病遣送回国，已经丧失大半，因此，西班牙政府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得不放弃这个岛屿。他说，到1898年年初，西班牙军队的士兵已经减少了百分之五十。这个数字并不是我的杜撰，是古巴总督府的第二号首脑贡萨莱斯·帕腊多将军提出的。这个数字同西班牙报纸上发表的战后遣返回国的名单是相符合的。在和约签订以后，陆续分批遣返回国的士兵，共有十一万九千五百名。”

但是索萨认为，这十万多人只是一支“有名无实的部队，因为几乎有一半人是躺在各地医院中的四万五千张病床上的——这是布兰柯在1898年开战时提供的官方数字。这些病床，有的安置

在一些所谓的医院里，其中有皇家救济院、哈瓦那教养院、雷格拉庄园储糖仓库、圣卡塔林纳仓库、‘圣·安勃罗西奥’医院、‘阿方索十三世’医院、玛德拉医院，这还只是哈瓦那的情况；在其他地区，病床都设在私人住宅和店铺里；甚至在一些省就设在铁路边上用棕榈叶搭成的营房中……”。

剩下来作战的又有多少人呢？索萨根据这些资料和推论，提出了一个数字，“如果那些徒劳而致命的跋涉也可以叫做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可以作战的约有六万人，六万患病初愈的人。只要倒霉的疾病稍稍减轻一点，略微有所好转，他们就立刻被撵出病房，投入艰苦的战斗任务。他们中所有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患过虐疾、阿米巴痢疾、热带性腹泻、肺结核。这一切灾祸，给这群食不果腹、衣衫褴褛、长满蚤虱、无依无靠的穷苦人带来了悲惨的后果；这些穷苦的士兵确实引起人们的同情，甚至引起了戈麦斯的同情，因为他们身体刚一好转，但还没有痊愈(在数天之内都不可能痊愈)，就得离开医院的病床，走向我们的森林、高山和沼泽地，过不了几天，又不得不带着更重的病体重新回到医院去。”

西班牙的两个大人物卡纳莱哈斯和布兰柯，以及古巴最英明的军事领袖马克西莫·戈麦斯，都以惊人的雄辩的事实，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要求西班牙士兵为抗击古巴军队打到“最后一人”的穷兵黩武政策，在1898年年初，已经到了怎样山穷水尽的地步。

索萨在引证他们的见解时说：“我无需申述任何别的理由，这些已经足以说明，当时在古巴，实际上不存在一支能够进行有效的战斗的西班牙军队”。他特别强调指出，“敌对双方意见如此巧合，实所罕见！”

关于前两人的见解，罗马诺内斯伯爵在他所著的《萨加斯塔或政治家》一书中作了介绍①。

罗马诺内斯说，“尽管萨加斯塔不欢喜保存文件，但是有几份经过精心挑选的文件却完整地保存在一个标明‘我们执政时的形势’的卷宗里。其中，有一封古巴总督布兰柯写的信，长三页；有两封卡纳莱哈斯从华盛顿和哈瓦那寄来的、篇幅很长的信。这些文件，是保守党人……执政后期的

① 罗马诺内斯伯爵：《萨加斯塔或政治家》，第191—194页。

完美总结。”

布兰柯说，他于1897年10月31日到达古巴接替魏勒的时候，见到的情况是：“行政管理的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士兵疲惫不堪，面无血色，住在医院里，毫无战斗能力，几乎连拿武器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岛国笼罩着恐怖。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呻吟在最可怕的专制统治下，为了脱离苦海，除了投身到叛乱的行列之外，已经别无出路。”

卡纳莱哈斯在那些日子里曾经访问了这个岛国，证实了西班牙政府和军队的绝望处境，在我们曾提到过的那封信里他对萨加斯塔说：“即使战争马上结束，……死亡人数也要在六十万人以上！多么可怕！……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战争，而有一个好的政府，这个美丽的岛屿将是一个多么富有的地方！”

军队的情况怎样呢？

他说：“人数的确很多，但是没有组织，而且被疾病和穷困生活折磨垮了。”

马克西莫·戈麦斯以自己的见解证实了布兰柯和卡纳莱哈斯这种惊人的论断，索萨把戈麦斯

的意见正确地评价为“评论古巴战争的空前绝后的最高权威”。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除摘引了解放军总司令的其他原话外，还抄录了这样两封信①。一封是 1897 年末，戈麦斯写给费尔南多·弗雷莱·德·安德腊德将军的，信中说：“布兰柯在这里所取得的成就比魏勒更小，一度是英勇军队的那些可怜的残余部队，已经不能进行激烈的战斗了”。戈麦斯在给托马斯·埃斯特腊达·帕尔马的一封信中，向他表示：“西班牙已经不可能再拿出二十万士兵和一亿比索给魏勒的接替者，使战争再拖延两年，然而古巴人却能抵抗到任何时候。您可以高声地去对人讲，可是我这个老头却不能因激动而冲昏头脑，……时间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现在到了该西班牙熄灭篝火的时候了……”。

索萨在第四十期《哈瓦那历史笔记》上发表的《古巴革命的胜利》一文中，第一次公布了戈麦斯给美国国防部长阿尔吉尔先生的一个立论鲜明的

① B. Souza: «Triunfo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 Cuadernos de Historia Habanera, 40», p. 22—23, 26—27. (索萨：《古巴革命的胜利；哈瓦那历史笔记第四十期》，第 22—23、26—27 页。)

文件，作为马克西莫·戈麦斯大元帅上述论断的补充。这个文件同布兰柯和卡纳莱哈斯的判断以及同我们已抄录的西班牙发表的统计数字是一致的。正如索萨说的，这个文件"证明我们总司令熟悉敌情的本领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这同西班牙总参谋部对古巴军情不摸底，更确切些说，是一无所知，恰成鲜明对照。"

这个文件"是由马克西莫·戈麦斯签署的一篇手稿，保存在索萨博士管理的费尔明·巴尔德斯·多明盖斯档案馆中"。下面就是文件的原文：

"1896年7月6日，发文第七十号

对美国国防部(阿尔吉尔)所提问题的答复。

1. 西班牙军队在古巴全岛的全部兵力可能达到十万人，其中约有六万人是作战部队，其余为伤病员，'义勇队'、救火队、别动队等。

2. 从胡卡罗和莫龙一线到比那尔德里奥①，

① 莫龙(Morón)位于卡马圭省西北部，是古巴产糖最多的地方。胡卡罗(Júcaro)是莫龙市南面塞戈阿维拉市沿海的一个小镇。1897年魏勒因慑于古巴解放军的声势，曾在莫龙和胡卡罗一线驻守重兵，妄图阻止戈麦斯将军亲自率领的部队向西推进。后来事实证明魏勒的军事部署是失算的，戈麦斯用奇兵突破了这一线。——译者注

西班牙有四万作战部队；其余二万人在卡马圭和古巴的圣地亚哥作战。

3. 一旦攻打哈瓦那，布兰柯将军可以拼凑四万部队防守这个城市，如果军火充足还可能临时组织一些民兵。西班牙部队的给养条件很糟，他们缺少马匹、车辆、衣服，士兵的健康状况非常恶劣。”

这就是卡诺瓦斯和萨加斯塔所奉行的打到“最后一人”的好战政策已经可耻失败的最后证明，其兵源的枯竭，已使它完全不可能再进行反对古巴解放军的战争。

为防御古巴和美国联军攻打古巴的圣地亚哥城，西班牙聚集了多少兵力呢？

塞维罗·戈麦斯·努涅斯在他的《西一美战争》一书中，提供了古巴的圣地亚哥师的遣返总人数。他说，那月10日至31日，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九人分乘十艘汽船驶往拉科鲁尼阿、维哥和桑坦德尔港①，其中有一万五千零六十七名陆海军士兵，

① 这三个地方均为西班牙的重要海港。前两者位于西班牙西北部，面临大西洋；后者位于西班牙北部，沿比斯开湾。——译者注

包括一些“义勇队的士兵”和别动队队员，其余的人是修女、牧师、电报员和家属。

阿图罗·安勃拉尔德在谈到他于1897年12月在纽约同托马斯·埃斯特腊达·帕尔马及“我们认为团结一致、观点一致的古巴革命侨民团体”的其他成员，为了在维护西班牙主权的基础上，取得同古巴人的谅解——这点遭到了古巴革命党代表的公开拒绝——而进行的磋商时说，促使他着手进行这次谈判的动机之一是：

“据布兰柯将军说，他几乎无法拼凑一支五万人的军队和三万人的别动队……同时，西班牙的舆论也不会同意再向古巴派遣一个人，也不会同意再拿出一个丕塞他去支持这场战争。”

让我们把参议员路易斯·姆·德·潘多将军在西班牙参议院说的一句话，作为卡诺瓦斯和萨加斯塔的概括为“打到最后一人，最后一个丕塞他”这句臭名远扬的话的好战政策的墓志铭吧。

“除自治方案外，布兰柯应当实行的政策，可以归纳为这样两个断然的否定：

“不再给一个人，不再给一个比索。”

15

在美国根据1898年4月18日国会通过的、于20日由麦金莱总统批准的“联合决议”，于涉西班牙一古巴战争之前，西班牙的经济与财政已经完全破产，已经到了卡诺瓦斯和萨加斯塔及其领导的两个轮流执政的西班牙大党决心以武力消灭古巴解放革命而不惜使西班牙政府面临的“最后一个丕塞他和最后一人”业已枯竭的绝境。

西班牙在西一古美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失掉古巴之后，在巴黎讨论和平条件时，西班牙全权代表曾提出要美国接管古巴的主权——皮·伊马格尔称这为“不体面的行为”——以便由美国负责赔偿殖民债款，美国全权代表当然拒绝这样做。皮·伊马格尔在1898年12月3日《新政权》杂志的一篇长文中，对西班牙经济和财政的破产做了这样的论述：“这里，预算从来没有平衡过。赤字是以国库的流动债务来弥补的，面流动债务又周期性地变成固定债务。公债的发行总额不断上升。如果把古巴所负的不下于三十亿丕塞他的国债全部承担下来，可以想象会有什么结果……预

算中的不平衡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即使我们把预算的支出部分增加到近十亿丕塞他，偿付债务也要占去绝大部分。这就势必要统一所有债务、停止清偿并对债务人实行等于降低利息的课税。”

关于皮·伊马格尔所提到的殖民债务，可以写很多。我们的同胞腊斐尔·马里亚·梅尔昌在他激动人心的革命辩护词《古巴，为独立战争辩护》（1896年于波哥大出版）中，有一章是专门对殖民债务进行分析与评述的。[①]

费利克斯·伊斯纳加在他的《殖民债务》[②]小册子中，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其目的就是上面已经谈过的：西班牙全权代表企图要美国接管古巴的主权，以便由美国来偿付这些债务。费利克斯在这本小册子中断言：“西班牙条约草案中所包括的各种债务总额，按整数计，约为五亿美元；这样

① Rafael María Merchán: «Cuba, justificación de su Guerra de Independencia», Bogotá, 1896, p. 30—40.（腊斐尔·马里亚·梅尔昌：《古巴，为独立战争辩护》，1896年波哥大版，第30—40页。）

② Félix Iznaga: «Ecos del Tratado de París; La Deuda Colonial», La Habana, 1917, p. 73.（费利克斯·伊斯纳加：《巴黎和约的反应；殖民债务》，1917年哈瓦那版，第73页。）

一大笔沉重的债务，不管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也不可能得到美国委员会的通过”。

伊斯纳加抄录了委员会对和谈会议上西班牙备忘录的答复，备忘录详细谈到了上述债务的来历和经过。

关于所谓古巴殖民债务，美国备忘录在最后一部分谈到，这笔债务的增加是由于西班牙为镇压 1895—1898 年的解放战争而支出的军费造成的。它说：“为了筹集镇压起义的基金，西班牙政府当时着手发行一笔新的公债；这样，在 1898 年 1 月 1 日流行市面的债券，就增至八亿五千零五十万丕塞他，相当于一亿七千一百七十一万美元。除此之外，还缔结了一项新的贷款，名为‘募集古巴战费贷款’，据美国代表们所知，其价值达八亿丕塞他，相等于一亿六千万比索。”

阿图罗·安勃拉尔德在他的《殖民札记》① 中，谈到 1895—1898 年战争时说：“每月的军费估计要超过一千万金杜罗②，而那支军队中能经

① 见该书第 159 页。

② 杜罗(duro)，原为西班牙银币名，合五个丕塞他。——译者注

常参加战斗的还不到一半人。"他又说:"据一位有名的军医总监拉腊·塞雷索先生说，从1895年3月战事发生，到1897年第一季度(他那博学的著作完成的日子)，西班牙国库支付的住院费用达到九百万人次，每次花费一个到一个半比索，或者五至七个法郎;再加上药品及外科器材等的费用，总共达到五百七十六万六千七百九十二法郎。"

奥尔特加·鲁维奥在他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摄政史》一书中，报道了西班牙为摆脱(但事实上却加深了)西班牙因古巴战争的巨额战费所造成的经济与财政上的严重危机，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之后说,"在1897年年中，我们的财政状况是极端恶劣的;国库已经枯竭，因而不得不求救于孤注一掷的大胆措施:7月27日缔结一项毁灭性贷款。"

阿图罗·安勃拉尔德在谈到我们曾经引述过的、布兰柯总督关于西班牙在古巴的军队急剧减少的声明时，评论说:"西班牙的舆论，也不会同意再向古巴派遣一个人，也不会同意再拿出一个丕塞他。"①

① 阿图罗·安勃拉尔德:上引著作，第287页。

塞维罗·戈麦斯·努涅斯在谈到西班牙面临在经济上不能继续这场战争，“最后一个丕塞他”业已枯竭的绝境时[①]说：“国库的空虚，使得该师（指古巴的圣地亚哥师）各部队欠发了十一个月的饷银。同时还拖欠了给养和医疗费用。”

而这种情况正好发生在西班牙当时不仅要抗击古巴解放军，而且还要对付美国军队和舰队的地方！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路易斯·莫罗特在《战败之道德》[②]一书中所提供的、取自财政大臣比亚努埃伐的资料和意见：

用于古巴战争的军费	1,796,269,462.91丕塞他
用于菲律宾战争的军费	165,988,257.72丕塞他
合计	1,962,257,720.63丕塞他

这位部长接着说：“殖民战争带来的结果是：一笔超过十四亿四千五百万丕塞他的新的流动债务；一笔数目为十四亿六千九百四十二万五千六

① Severo Gómez Núñez:«La Guerra Hispanoamericana, Santiago de Cuba», p. 52—53.（塞维罗·戈麦斯·努涅斯：《西美战争，圣地亚哥德古巴》，第52—53页。）

② 见该书第83—99页。

百二十五丕塞他的分期偿付的债款；每年支付的利息及本金为二亿五千二百七十九万七千五百六十丕塞他零四十七分；再加上估计约有三亿丕塞他的赤字。”

对于这些数字，莫罗特作了如下评论：“这一灾难是严重的、非同小可的，它会给一个国家留下深刻的创伤。”

莫罗特最后说：

“梅利亚战役的错误；为战争而战争的理论的错误……（它造成了全国的迅速贫困化）……战至最后一人和最后一个丕塞他的政策的错误；没有接受美国在奥尔尼的照会中所作的调停的错误；——凡此种种，好象是一只魔手，把我们拖进这一痛苦的困境。”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呈现在西班牙面前的，是如下一幅图画：一切都失去了……失去了财富，失去了西班牙刚开始恢复的国力，甚至也失去了我们在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无比勇敢的声誉。”

16

卡诺瓦斯和萨加斯塔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两个在西班牙的历史上长期以来轮流执政的政党，宁愿选择好战政策——这一政策可以概括为那句作为两党及其领袖们的座右铭和口号的名言：“打到最后一人和最后一个丕塞他”——作为他们把1895年的解放革命消灭在襁褓中的最恰当政策，而不愿把古巴岛交还给古巴人民；但是，尽管西班牙在岛上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精良的武器，革命的发展和它的广泛群众性，解放军不可战胜的强大威力，已使他们看到，要用战争来结束战争，以达到他们追求的目的，是无益之举。

卡列哈被马丁内斯·坎波斯所代替，坎波斯被魏勒所代替，魏勒又被布兰柯所代替，卡诺瓦斯本人决定放弃战争政策，代之以和解的措施，萨加斯塔推行自治政策，遭到古巴革命的断然拒绝，——所有这一切，都完全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形势的严重，对失败的不打自招，在卡诺瓦斯

1896年5月9日晚10时30分，对4月12日大选中新当选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的讲话中，清楚地表明了。安东尼奥·马里亚·法维埃从他父亲——卡诺瓦斯的密友和忠实的助手的文件中找到了这篇演说的原话，并把它抄录在他所写的《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① 一书中。

"今天最使我们关心的是古巴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如此严重与重要，它要求政治家代表整个民族关注它的命运，并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去最终解决我们共同需要解决的这全部问题。

"仅仅下决心用战争来结束战争，而不准备在某种情况、某种时机之下，当荣誉许可的时候，作出某些让步是危险的；但是以为通过这种或那种让步就可以使一个既不谋求、也不需要甚至拒绝这种让步的分离主义党老老实实，那是同样危险的，或是更加危险，在我看来，要危险得多。

"只有心怀祖国，才会知道什么行动是适宜的，怎样才能拯救祖国的利益，随之也拯救它的荣誉和主权完整。"

---

① 见该书第336—337页。

卡诺瓦斯对于“打到最后一人和最后一个丕塞他”的好战政策的彻底失败，对于古巴革命不可抗拒的强大威力所做的这一极为痛心的供认，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安东尼奥·马里亚·法维埃对我们回答了这一点：

“当家父开会回来，到家脱去燕尾服的时候，他说了下面的话：‘多么不幸！我们出席了向西班牙在古巴的主权告别的官方仪式。’”

我们再抄录法维埃书中的一段话[①]：

“1897年7月18日上午，也就是在震动全国的圣阿盖达事件[②]发生几天之前，家父同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在乌埃尔塔[③]他的办公室中，举行的最后一次政治谈话是非常有意思的。家父曾多次向我原原本本地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这些资料仍然保存在我所记的笔记中。这就使我今天

① 安东尼奥·马里亚·法维埃：上引著作，第353—354页。

② 圣阿盖达（Santa Agueda），在西班牙吉普斯夸省，是一著名温泉。1897年8月8日，卡诺瓦斯在此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译者注

③ 乌埃尔塔(La Huerta)，是马德里卡诺瓦斯的公馆。——译者注

有可能差不多毫无遗漏地把它重述下来。”

下面是卡诺瓦斯的话：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结束战争。关于菲律宾，我很放心。我相信那里的情况很快就会完满结束。至于古巴，日益使我更加相信事情越来越糟。因为军人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些将军、指挥官和军官们，不了解这个国家已经不堪忍受这样的负担，不了解美国正在等待进行干涉的机会，如果美国进行干涉的话，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我们不体面地屈服；不必设想西班牙能同美国巨人开仗。这是不可能的。我决计命令我们的军队在年底以前结束战争。我想有一次短期的休息，待我回来以后，将改组内阁，并召开议会，提出我的计划。在这个时期，或许是我政治生涯的最后时期，必须要有一些象您那样自1870年以来就跟随我的人和我在一起。”大概因为家父做了一个表示惊奇和不高兴的手势，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接着说：“不许反驳。科斯-卡约恩、埃尔杜阿炎和您，都参加内阁，但我不把皮达尔也拉进来，因为我要他担任议会议长的职务。假如我们共同努力的结

果，并不能结束古巴的叛乱，以致使美国不得不承认它，那末，到12月30日，我就让位给自由党，由它去用自治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从此也就解甲归田了。”

在西班牙和古巴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断言，古巴革命没有被打败，是由于卡诺瓦斯的去世和魏勒的被召回；还有人胆大妄言，说美国人把古巴解放者从注定要遭受的、迫在眉睫的失败命运中拯救出来，使他们从西班牙军队的刺刀下死里逃生。而卡诺瓦斯却说这支军队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军人。请问，所有说这些话的人，又怎样解释上面的供词呢？

萨加斯塔，同卡诺瓦斯一样，也不得不供认古巴革命不可战胜的强大威力和战争政策的失败。

事实确是如此，根据加夫列尔·毛腊·加马索的引证①，萨加斯塔在1897年5月19日，“在议会开会前夕，对他本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作了一次充满激烈反对言词的演说。这位自由党领袖，谴责保守党政府用了二十万人和十亿丕塞他而不

① 见上引著作，第1卷，第317页。

能平定古巴西部各省(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才使我国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但它还不知道在东部地区除了我们的士兵脚下踩着的土地外，再没有一块土地归我们所有。萨加斯塔认为卡诺瓦斯所提出的改革是不会有结果的，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濒于绝境，政策的改变已属不可避免。”

卡诺瓦斯传记的作者莱马侯爵也提到了这篇演说，然而他为了替卡诺瓦斯辩护，对这篇演说进行了抨击。

因此，当卡诺瓦斯逝世，萨加斯塔在摄政王后的绝望请求之下，答应上台执政的时候，这位曾经和卡诺瓦斯争先提出“打到最后一人和最后一个丕塞他”的人，不得不利用我们前面已经引述过的，路易斯·姆·德·潘多在1898年10月22日向参议院提出的文件中讲的一句话：“不再给一个人，不再给一个比索。”

17

现在请看1898年西班牙舰队最高统帅巴斯卡尔·塞尔维腊海军上将和舰队参谋长维克多·

姆·孔卡斯所作的两篇非同寻常的供状吧。

塞尔维腊说:

"……我们心自问,我是否应当对那一旦发生就足以使西班牙完全毁灭的冒险保持沉默并且支持它呢?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保卫一个过去属于我们的岛屿。因为,即使战争没有使我们在法律上失去这个岛屿,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失掉了它,连同我们的一切财富和一大批的青年都失掉了,他们为了保卫一个虚构的理想,做了恶劣气候和枪炮子弹的牺牲品……。我不能确切知道,祖国人民对古巴抱着怎样的感情;但我倾向于这种看法,即绝大多数西班牙人首先是希望和平的,只不过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他们宁可在家中受苦,悲痛,也不跟着那些因战争的继续而发财的少数人一起去叫嚷;但是这类问题不是我应该分析的。"(给"玛丽亚·特雷萨公主号"装甲巡洋舰舰长、古巴的圣地亚哥海战时西班牙舰队参谋长维克多·姆·孔卡斯·伊巴劳海军上校的信件)①

① Víctor M. Concas y Palau: «La Escuadra del Almirante Cervera», Madrid, p. 74—76. (维克多·姆·孔卡斯:《海军上将塞尔维腊的舰队》,马德里版,第74—76页。)

孔卡斯说：

“虽然美国作家们力图否认这点，但古巴的叛乱已经使战争结束了，这个岛屿已不再是我们的了，就象我们已经抄录的塞尔维腊海军上将1898年2月26日的信件中所说的那样。

“西班牙接受〔同美国〕作战时，古巴岛事实上已经丢失了，那时再派一个人到古巴都势必要发生难以想象的严重暴乱事件，那时我们军队缺乏最需要的物资，拖欠军饷已成为营养不良和士气低落的主要原因，同时，居住在古巴的相当一部分西班牙人一面以改良主义者、自治主义者等名义与叛乱者同流合污，一面又在买卖、供应和运输中大赚其钱。”①

18

尽管美国早从遥远的杰斐逊总统的时代起，就是古巴自由与独立的敌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1949年出版的《古巴与美国》一书中作了阐

① 维克多·姆·孔卡斯：上引著作，第97、236页。

明，该书的结论已为古巴第六届全国历史会议所通过；读者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也会概括地了解这一点——，但是大量的美国官方文件一方面证实了这种反对古巴解放理想的敌对态度，另一方面也包含了非常雄辩的证据，证明（等于公然供认）古巴的广大舆论是支持这种理想的，从1895年到1898年，解放军所表现的威力是强大的，西班牙对镇压革命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说，1896年4月4日，奥尔尼给西班牙驻华盛顿代表的著名照会，是凄惨地透露了国内舆论鄙视西班牙驻华盛顿代表和克利夫兰的一个例子。那末，照会也供认了当时革命所取得的强大威力——“它的迅速壮大和发展”——，同时还表明西班牙显然已无力击败革命。因此，奥尔尼对西班牙驻华盛顿公使杜普·德·洛梅说：“不容否认，1895年夏天和秋天你们所抱有、且为全体西班牙人乃至为许多公正观察家所共有的希望，已经完全破灭了。”

接着奥尔尼对解放军的活动作了高度的评价：①

“看来叛乱者目前在岛上所控制的地区超过

了任何时期；一年前，武装人数估计为一万至二万人，现在公认至少增加了两三倍。

“与此同时，他们的纪律性加强了，现代化武器的供应大大增加。他们能够坚持到现在的事实本身，使他们增强了信心，在全世界的威望提高了。总之，叛乱非但没有被平定，且其声势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在进入第二年的时候，其成功的希望肯定会更大。否认这一点是不公正的。”

似乎言犹未尽，他又补充说：“叛乱者对西班牙当局的反抗丝毫没有减弱，西班牙政权在岛上大部分地区的垮台将成为非常明显的事实。”

奥尔尼最后说出了他的忧虑，他说：“这次叛乱在时间上一定比过去的叛乱要短，因为西班牙不可能继续作战，它迟早总要结束。”

1897 年 3 月 4 日麦金莱上台以后，美国新任驻马德里公使斯蒂华特·伍德福，在呈递国书以后，于9月18日同西班牙国务大臣特图安公

---

① Emilio Roig de Leuchsenring: «Cuba y los Estados Unidos», La Habana, 1949, p. 194—197.（艾米里奥·罗依格·德·卢其森林：《古巴和美国》，1949 年哈瓦那版，第 194—197 页。）

爵[1] 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会谈中，他转达了美国政府关于古巴事件的指示。

在谈到 1895 年的革命时，他说，[2]"革命迅速地蔓延着……战事几乎扩大到了全岛，发展到西部各省，这是雅腊[3] 暴动所没有达到的规模"。他又说，"两年多来，古巴岛上愤懑的居民和宗主国之间进行了一场空前的斗争。"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越来越深信不疑，即使假定西班牙彻底消灭古巴的军队而把古巴征服的话，它也不会，而且远远不会同西班牙保持过去曾一度保持的那种和宗主国的关系。抱有这种希望，对西班牙来说，纯粹是幻想。"

显而易见，他承认了革命的强大力量，承认了

---

① 他的真实姓名叫卡洛斯·奥东内尔·伊阿勃兰(Carlos o'Donnell y Abrán)。特图安原是西属摩洛哥的一个城市。——译者注

② 艾米里奥·罗依格·德·卢其森林：上引著作，第 205—207 页。

③ 雅腊(Yara)是奥连特省曼萨尼罗管辖区的一个小市镇。1868 年 10 月 10 日革命爆发时，塞斯佩德斯曾在这里发出独立号召，取名《雅腊呼声》(El Grito de Yara)。(参见本书第 1 部分第 3 节译注。)——译者注

古巴不愿再受西班牙统治的坚定不移的态度，也就是说，西班牙已经完全失去了古巴。

由于西班牙维持对古巴统治的希望已经破灭，美国决心插手古巴反对西班牙的独立斗争的时刻已经日益迫近。

形势急转直下。萨加斯塔于10月4日上台执政。魏勒在31日被布兰柯所接替。西班牙为赖在古巴作了最后的尝试：11月25日国王颁布法令，对古巴实行自治。

麦金莱在本国舆论坚决要求承认古巴独立、而第一步是承认革命政府和军队为交战一方的压力下，于1897年12月6日向国会提出一项咨文，承认古巴革命从一开始就来势凶猛，承认革命的"惊人发展……对西班牙为镇压暴动而大量集结的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西班牙镇压暴动的努力遭到破产"，而"暴虐的政策……惨无人道的集中营法令"[1]也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现在已到了美国统治者感到有必要阻挠古巴人以自己的力量铲除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的关键

① 艾米里奥·罗依格·德·卢其森林：上引著作，第213页。

已经失去了古巴，由于兵员枯竭、国库空虚，它已经不能继续同解放军作战了。对这些意见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这里只引述参议员阿兰的意见和参议院的决议作为例子。阿兰承认“古巴共和国政治上的存在和民族独立，现在是，而且早就是由武装力量捍卫的。”参议院以六十七票对二十一票通过的决议，则宣称“古巴人民是自由和独立的，在法律上也应当是自由和独立的，美国政府现在承认古巴共和国政府是古巴岛真正合法的政府”。

虽然参议院决议的这一部分并没有在4月18日由国会最后通过并于20日由麦金莱总统批准的“联合决议”中得到采纳，但是决议忠实而确切地表达了美国广大人民要求承认解放军革命政府为古巴共和国合法政府的意志的崇高意义是无法抹煞的。

美国人民之所以承认这一点，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古巴革命对此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解放军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古巴的战士和全体儿女表现了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精神，因为古巴人民有着坚定不移的意志，决心打倒西班牙专制政权，争取独立和自由，争取以享有主权、文化和文明的国家

身分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

这种争取自由的不可动摇的意志，解放军战无不胜的强大威力以及解放军将领的指挥才能，在西班牙—古美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以至1943年在哈瓦那举行的古巴第二届全国历史会议能够严正地宣称："古巴解放军对美国军队的支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解放军副总司令卡利斯多·加西亚少将的非凡行动在这里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古巴解放军的参战，西班牙军队才被击败。"

因此，"不应再象过去那样，在群众中和官方文件中，把1898年的战争称为西美战争，而是必须称作西班牙—古美战争，这一名称应当由古巴人来规定并加以推广。"

1945年5月16日古巴共和国的法令批准了这一名称。

尽管美国侮辱性地拒绝了卡利斯多·加西亚少将参加古巴的圣地亚哥城的受降仪式，——这实际上等于否认他的部队在古、美胜利中的有效合作，从而引起加西亚将军的严正抗议——，但是美国将军谢夫特、路德洛和迈尔斯都承认解放军

对于战胜西班牙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①

卡利斯多·加西亚抗议美国政府不公正做法的这种勇敢而严正的表率态度，绝不是无益的。这一态度，代表了古巴全体人民的抗议，他们三十年来，毫不妥协地反抗了西班牙的专制政权，同时由于军事将领们的杰出才能，由于光荣的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由于岛上和海外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终于打败了西班牙这一军事强国，战胜了西班牙军队的王牌将军——马丁内斯·坎波斯、魏勒和布兰柯。

谢夫特在答复加西亚的抗议信时说："区区小事竟使你如此光火，对此我深感遗憾。"他辩解说："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我是无权争论的。"这一政策就在于：当美国认为古巴人对实现他们打败西班牙的目的必不可少时，就利用之；当胜利以上面所谈到的方式取得之后，古巴人成为他们实现其吞

---

① Felipe Martinez Arango: «Cronología crítica de la Guerra Hispano-cubanoamericana, Cuadernos de Historia Habanera» №. 43, p. 124,125,137.（费利佩·马丁内斯·阿兰戈：《西班牙—古美战争评论年表，哈瓦那历史笔记》，第43号，第124、125、137页。）

并计划的障碍时，他们就一脚踢开之。

但是谢夫特无法否认古巴军队参加战斗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对加西亚说：

“在我给政府的正式报告中，我对您和您英勇的军队，作了完全公正的评价。对您在这次战斗中给予我的巨大帮助和宝贵合作，我仅向你表示感谢。”

曾经参加过对圣地亚哥攻夺战和受降仪式的一位旅长、后来在美国干预古巴时担任哈瓦那市军区司令的威廉·路德洛，在写给加西亚将军的信中(这封信后来在美国报上发表了)说：

“亲爱的加西亚将军：

“请允许我向您、也向我们自己祝贺，因为现在看来圣地亚哥的问题已经顺利地解决了，我们的部队在配合作战中攻占了这个城市，西班牙人已经撤退，该城的和平已经恢复了。

“请允许我告诉您，您的部队完成了最有价值的任务，他们的工作对我们是不可估价的，他们不仅作为侦察员，搜集了许多情报，而且在围攻这个城市中，完成了挖掘战壕和修筑防御工事的重大任务。

"您的士兵差不多是在缺乏应有装备的情况下完成大量工作任务的，而当继续包围城市要求我军各团向右方推进时，他们慷慨地把工事交给我们。

"将军，我是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代表官方说这番话的，因为我只是一个下级指挥官。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同您的部队有较多的接触，我有较多的机会，也许比任何一个人都能更好地观察到他们的工作和这种合作所具有的意义。"

这次战争中的美国军队总司令纳尔逊·阿·迈尔斯少将，在他的《陆军全貌》一书中说：

"我对古巴爱国者承担了一项义务，这项义务要求我阐明古巴政府和军事当局所提供的合作的事实。

"谢夫特将军和他率领的远征队到达圣地亚哥海港附近时，他由海军上将桑普森陪同，在阿赛腊戴罗古巴军队的参谋总部访问了加西亚将军，同他商谈从陆上进攻的问题。会谈决定美国军队不在圣地亚哥海港的西面登陆，而在东面登陆；古巴部队被派去增援已经占据了掩护美军登陆的有利地形的拉蒙·德拉斯·亚瓜斯旅。这支古巴增

援部队由卡斯蒂略将军统率在锡瓜登陆，接着向达奎里挺进。西班牙人被赶出了阵地，古巴人立即占领；因此当美国舰队炮轰这个阵地时，伤亡的只是古巴人。从这时一直到战斗结束为止，无论在瓜西马斯或卡内，还是在费尔米萨和西博内，冲锋陷阵的都是古巴人①。

“加西亚将军执行谢夫特的命令，率领四千名古巴士兵于7月1日清早5点30分开始向马里亚纳赫进军，7点钟拿下了指定要占领的阵地。马里亚纳赫位于卡内和圣胡安山之间，他（加西亚将军）接受的任务是保卫卡内和圣胡安，以防敌人在战斗中从圣地亚哥出击增援这两个地区的阵地。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所有的古巴人冒着敌人的炮火作战，伤亡约一百人。白天的战斗结束后，遵照谢夫特的指示，加西亚将军率领他的部队，连夜向右侧转移。2日黎明，到达圣地亚哥城的北部，在近郊占领了一处险要的阵地。当天，驱逐了在瓜维塔斯和博尼亚托两个村镇的敌人，占领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据点，最后包围了圣维森

① 这一段中谈到的这些地点，均在圣地亚哥外围。——译者注

的。他叙述的事实和分寸将得到人民的赞同。但西班牙人和他们美国的朋友当然不会同意。前者对加西亚和谢夫特的决裂自然感到幸灾乐祸，而后者都是很高兴看到加西亚和谢夫特决裂；后者，金融投机商，他们一向反对争取自由的战争，现在又展开了一场掠夺战，他们一有机会，就兴高采烈地大喊大叫，说古巴人无能管理自己的岛屿。这批守财奴躲在私人的塔楼上，了望着那些防范不严的美元，愤怒地叫嚷着：'他们只是少数。'

"加西亚和戈麦斯的衣衫褴褛的士兵可能是少数。华盛顿的衣衫褴褛的士兵也是少数。

"但他们都是共和主义者，而着手建立古巴未来政府的责任，只能落在共和主义者的肩上。

"《新闻报》始终是古巴的朋友，它致电给加西亚将军、戈麦斯将军、部队的英勇战士以及古巴全体爱国人士。电文如下：

"请相信美国人民。他们是这个共和国的真正统治者。总统和国会是他们选举的。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正是为了解放古巴，为了把古巴岛交给它自己的忠实、英勇的儿女，美国才同西班牙作战的。这个国家是决不食言的，保证一定要兑

现。”

总而言之，已经非常清楚，古巴人民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赢得它的独立的。

第二部分

美国一向是古巴独立的敌人

1

古巴在美洲大陆所处的异乎寻常的地理位置；幅员狭小，人口稀少而庞杂；土地极为肥沃富饶；古巴人民所经历的历史、经济和社会环境；同美国领土毗邻；——这一切就使得古巴岛比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更为美国所垂涎，成了美国贸易扩张所必需的、美国海防所不可缺少而又唾手可得的猎物。

早在1805年，在古巴人开始为争取自由而进行斗争以前若干年，美国的统治者就想占有古巴，并且进行了公开的活动。当年11月，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给英国驻华盛顿公使的照会

中[①]，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一旦同西班牙作战，美国鉴于保卫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美国对该地同样抱有野心——的战略需要，就将占领古巴。杰斐逊在1807年和1808年一再重申这种看法。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美国企图占领古巴不仅是由于这个岛国的地理位置和邻近美国的原故，而且因为美国和英国的竞争，美国担心英国会通过征服或割让的方式占有古巴。

2

从那时起一直到1898年，美国历届政府对古巴的政策始终没变。美国任何一个执政党所奉行的政策都是：当美国还不可能或者还不适宜占有古巴的时候，就继续维持西班牙的统治。在古巴岛的归属问题上，美国特别关心的是来自英国的

① J. Fred Rippy: «Rival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over Latin America (1809—1830)»,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29, p. 72.（弗雷德·里皮：《美国和英国在拉丁美洲的竞争，1809—1830年》，巴尔蒂摩尔，1929年约翰·霍普金斯出版公司版，第72页。）

危险，而不是西班牙。美国在这段漫长时期中，一直采取所谓熟果政策。这是门罗总统的国务卿、后来继门罗之后出任总统的约翰·昆西·阿丹姆斯，在1823年4月28日委托美国驻马德里公使赫·纳尔逊先生转呈西班牙国王陛下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的。① 备忘录同意并阐明了杰斐逊提出的美国并吞古巴的主张和占有古巴的迫切需要。美国担心西法战争可能使西班牙丢掉古巴和波多黎各，因而才促使国务卿阿丹姆斯正式表明美国

① Francis Wharton: «Dig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p. 361—366.（弗兰西斯·华尔顿：《美国国际法摘要》，第361—366页。）罗德里盖斯：上引著作，第57—60页。

Robert Granville Caldwell: «Expediciones de López a Cub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15, p. 29.（罗勃特·格兰维尔·卡尔德韦尔：《洛佩斯的古巴远征队》，1915年普林斯敦大学出版公司版，第29页。）

Herminio Portell Vilá: «Historia de Cuba en sus relaciones con los Estados Unidos y España», La Habana, 1938, t. I. p. 225, y sgts.（埃米尼奥·波台尔·比拉：《古巴同美国和西班牙的外交关系史》，1938年哈瓦那版，第1卷，第225页及其他各页。）

Antonio Pirala: «Anales de la Guerra de Cuba», Madrid, 1895, t. I. p. 772, 774.（安东尼奥·皮腊拉：《古巴战争编年史》，1895年马德里版，第1卷，第772—774页。）

政府对这两个岛屿所持的态度和意图。

阿丹姆斯说：

“这些岛屿，由于其所处位置，无疑是北美大陆的天然延续，其中尤以古巴，与我国海岸对面相望，据多方面理由，对美国政治和贸易利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根据阿丹姆斯下面所举的多方面的理由，对美国来说，任何外国领土都不能和古巴相比：

“古巴在墨西哥湾和安得列斯海所处的险要位置，当地居民的性格，它位于我国南海岸和圣多明各岛的中间，宽广的哈瓦那避风港与我国缺少良港的漫长海岸线遥遥相对，它的生产和消费的特点为双方互利的贸易提供了基础，所有这一切集中起来，就使古巴对我们民族利益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任何其它外国领土都不能与它相比；而我们同它的关系，差不多与我联邦各州之间的关系一样。”

对这位美国政治家来说，把古巴和美国结合在一起的，“由天然条件所形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和巩固起来的地理、贸易和政治的联系”，是如此重要和牢固，以至他并非出于个人的

动机，而是从美国当时和以后的切身利益出发，预言美国有占有古巴的迫切需要：

“当人们展望未来五十年内事态可能发展的进程时，几乎不能不相信，为使联邦继续存在，为确保联邦之完整，将古巴并入我联邦共和国势在必行。”

阿丹姆斯是一兼并主义者，但在其兼并主义范围内，他又是机会主义者。他深信美国迫切需要占有古巴岛；正象他在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他意识到英国可能支持西班牙，而这一联盟和支持的代价可能会出让古巴和波多黎各。他向西班牙表明，美国政府和公众舆论坚决反对这种转让，认为它危及联邦的利益，从而“迫使我们决心阻止这种做法，必要时甚至使用武力”。但是，阿丹姆斯和后来的克利夫兰以及麦金莱一样，并不认为，美国在那个时期应当采取行动。他们认为，只要西班牙保留古巴而不把它转让给英国，就已经足够了。

古巴必然而且必需为美国所占有的日子是一定要到来的。他们盼望着瓜熟蒂落的那一天。而在当时是不宜操之过急的，因此他们避免进行干涉。阿丹姆斯这样说：“显然，对此（美国并吞古

巴）我们尚未做好准备；乍一看来，会有许多人激烈反对我们向海外扩张……但是，就象万有引力法则一样，政治上也存在引力法则。就象树上的果子被风吹下，必然要落到地上一样，古巴一旦脱离西班牙，割断与西班牙那种人为的联系，就不能自己生存，而必然并且只能倒向北美合众国，同时，由于同一个法则的作用，北美合众国绝不能拒而不纳。”

阿丹姆斯的话，表明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对古巴所一贯奉行的政策。历届美国政府、政客、商人和资本家对古巴的看法，在任何时候都是和阿丹姆斯一样的，他们也和阿丹姆斯一样，看到美国有占领古巴的必要性。所不同的只是占有的方式而已：并吞，收买，军事占领，通过普拉特修正案使它成为听命于华盛顿的共和国，美国资本购买它的土地，进行经济控制等等……以及耐心地等待瓜熟蒂落的日子。

3

阿丹姆斯发出备忘录之后八个月，1823年的

12月2日，詹姆斯·门罗总统向国会提出第七次年度咨文，阐述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即历史上的门罗主义。[①]

美国政治家在阐明这一理论时，是否考虑到古巴呢？

不仅考虑到了古巴岛，而且古巴的未来正是促使门罗主义产生的直接和主要的原因。古巴在当时，而且后来一直是对美国切身相关的问题。美国认为危险并非来自西班牙，而是来自英国。1823年，在古巴问题上，英国就是美国的最大危险。这一点在上面提到的4月28日阿丹姆斯的备忘录中可以证实：美国决心阻止西班牙把古巴转让英国，"甚至使用武力"。

约翰·昆西·阿丹姆斯在《日记》[②]中透露，

---

① Isidro Fabela: «Los Estados Unidos contra la libertad», Estudio de historia diplomática americana, Barcelona, 1923, p. 24.（伊西德罗·法维拉：《美国反对自由》，美国外交史研究所，1923年巴塞罗那版，第24页。）

② Allan Nevis: «The Diary of John Quincy Adams, (1794—1845)», New York, 1928, p. 295.（阿兰·奈维斯：《约翰·昆西·阿丹姆斯的日记（1794—1845）》，1928年纽约版，第295页。）

备忘录是这种不安情绪的产物，是因为从3月中旬开始就“担心英国可能采取行动”。这种担心由于英国外交大臣乔治·肯宁8月20日向美国驻伦敦公使罗勃特·勒许提出的一项建议而加剧了，肯宁建议美英两国为防止“神圣同盟”① 和法国占领拉丁美洲领土发表一项联合声明。

足智多谋的国务卿阿丹姆斯，为了避开英国为美国设下的圈套，以巧妙的外交手腕拒绝了肯宁的建议，从而不至于束缚住美国将来在美洲活动的手脚。美国单方面发表了一个反对“神圣同盟”、而主要是反对英国的宣言，其目的是排斥欧洲对美洲的任何干涉，主要是英国的干涉，同时使美国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在美洲自由行动。

1823年12月2日，包含美国最著名的对外政策原则的咨文问世了。这一政策既不是以其倡议者肯宁先生的名字，也不是以其真正作者国务卿

① 1814年欧洲反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各战胜国为了维护维也纳会议的反动决议和以“宗教信仰”的名义进一步干涉与镇压各弱小国家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曾由俄国沙皇提出而经奥皇及普王赞助，成立“神圣同盟”。但英国并未参加这个同盟。——译者注

阿丹姆斯的名字，而是以签署这一重要文件的门罗总统的名字命名的。

粉饰门罗主义的普拉特修正案，也有过同样的遭遇。修正案没有以提议人和起草人埃立富·路特的名字命名，反倒用了把修正案提交参议院的参议员奥得尔·普拉特的名字。

在阿丹姆斯同门罗总统举行的各次讨论以及阿丹姆斯为同样目的——旨在劝说他们有必要提出门罗主义的政策——征询前任总统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意见的谈话中，美国政治家们最感兴趣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古巴。危险的是英国而不是“神圣同盟”。阿丹姆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要使我相信‘神圣同盟’会恢复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无异于相信琴博腊索[①]会沉入大海”。[②]虽然阿丹姆斯不相信“神圣同盟”有什么危险，但他认为美国表面上反对它一不会招灾惹祸，二来还可以达到预防和制止真正的危险——英国的目的。同时，单方面的声明不会受到大不列颠的阻挠，因

① 琴博腊索（Chimborazo），是南美厄瓜多尔境内的著名火山，拔海六千五百三十米。——译者注

② 阿兰·奈维斯：上引著作，第303页。

为这原是肯宁建议美英两国共同发表的。

这就是门罗主义的实质和目的。既不是为保护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免遭欧洲的侵略，更不是为了支持古巴。

美国政治家拒绝肯宁的建议，抛出门罗主义，多次协助西班牙继续占领古巴，一贯反对古巴人争取的和美国公民支持的古巴独立的意图，都是符合这一行动路线的。

1823年4月28日的备忘录，是门罗主义的一个巧妙的前奏。这两个文件都是国务卿阿丹姆斯精心设计的。后来所有的美国政治家在古巴问题上都必须遵循这一政策：当古巴不能为美国所有时就归西班牙所有，但永远不归古巴人所有。

阿丹姆斯对古巴的这一政策，还反映在另外两个重要的文件上：1898年的“联合决议”和1901年的普拉特修正案。这四个文件，包含了美国和古巴关系的指南。“联合决议”和普拉特修正案把古巴完全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就象阿丹姆斯在1823年4月28日的备忘录中所指出的以及同年12月12日发表的门罗主义竭力主张的那样。

4

当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在1825年筹划以两国的军事力量，把古巴从西班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时，美国坚决反对这一意图。阿丹姆斯政府的国务卿亨利·克莱先生曾于4月27日向西班牙保证："美国宁愿古巴和波多黎各依附于西班牙……美国对西班牙统治古巴和波多黎各的现状及其目前所实行的对我国贸易门户开放的政策，表示满意。美国政府绝不希望发生影响现状的任何政治变革。"① 两年之后，克莱（那时已任美国总统）重申这些观点，不仅反对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而且也反对古巴革命者，他宣称："鼓励和支持古巴革命运动不是美国的政策和观点，即使美国居民中有人企图这样做。"②

① «U. S. Ministers Instructions», vol. X.（《美国政府各部的指示》，第10卷。）

② 弗雷德·里皮：上引著作，第72页。

5

1826年，美国官方断然反对解放者波利瓦尔[①]在巴拿马会议上提出的使古巴和波多黎各获得独立以及废除奴隶制——会议召开的另一目的——的计划。缅因州的参议员约翰·霍姆斯，在参议院阐述了国会和政府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我们难道能允许古巴和波多黎各岛落入那些因刚获得自由而冲昏头脑的狂人之手吗？什么是我们该采取的政策呢？古巴和波多黎各应当保持原状。"[②]

阿丹姆斯总统在同年3月15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建议"我们的一切努力，必须导至使两岛屿维

---

① 西蒙·波利瓦尔（Simón Bolivar, 1783—1830），是委内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他二十岁左右就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一生曾参加过四百七十二次战斗。他的有名的誓言是："在我没有打碎西班牙束缚我祖国的枷锁前，我的手将不倦地打击敌人，我的心将不会安静。"委内瑞拉人民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十年的艰苦战斗，终于赢得了独立（1811年）。他还帮助了南美另外几个国家（哥伦比亚、秘鲁等）的独立运动。——译者注

持现状，保持岛上的安宁，保障居民的和平和安全。”③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3月25日建议只派观察员而不派代表出席巴拿马会议时——实际上他们未来得及出席这次会议——表示，鉴于美国一向关心古巴岛的未来命运，美国必须防止策划已久的、企图使古巴独立的入侵行动，因为“我们同古巴的关系，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古巴发生的一切，势必影响我国的工业**，而摩洛堡④则可看作

② J. I. Rodríguez: «Estudio histórico sobre el origen, desenvolvimiento y manifestaciones prácticas de la idea de Anexión de la Isla de Cuba a los Estados Unidos de América», La Habana, 1900, p. 80—81.（罗德里盖斯：《美国并吞古巴岛的思想之起源、发展及其实际表现的历史研究》，1900年哈瓦那版，第80—81页。）

③ «Ma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t. II, p. 336.（《总统的咨文与书信》，第2卷，第336页。）

④ 摩洛堡在哈瓦那海湾进口处左岸，建于1632年，最初用来防御海盗，1782年外国侵略者攻打哈瓦那时，在摩洛堡前遭到彼贝·安东尼奥率领的古巴第一支人民武装的抗击。

在十九世纪中叶，摩洛堡又成了西班牙殖民者囚禁古巴革命志士的政治牢狱。巴蒂斯塔时期，摩洛堡是杀害革命烈士的人间地狱。革命先驱者何塞·马蒂曾在这里被监禁过。——译者注

是密西西必河口的要塞。”

巴拿马会议在古巴和波多黎各独立问题上所以没有达成明确的协议，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反对。

6

1827年，波利瓦尔制定的、由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统率军队进入古巴的计划，得到安东尼奥·派斯本人的热烈支持。但却遭到美国的反对。美国的态度成为计划不可克服的外来障碍和失败的原因。这一点，在何塞·安东尼奥·派斯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说到这件事我感到非常痛心。华盛顿政府拚命地反对古巴的独立，它所依据的理由之一（这一点应当永远作为拉丁美洲人民的教训），就是：'从各种意义上来看，没有一个强国包括西班牙在内，象美国那样对古巴未来的命运如此关切，……就我们（美国人）来说，我们不希望古巴的隶属问题和政治状况发生任何变化，因而如果西班牙的统治权转让给另一欧洲强

国，我们决不会置之不理。我们也不希望它转让或加入任何一个美洲新兴国家’。”①

7

英国在加那利群岛和古巴策动叛乱的阴谋被揭露以后，美国国务卿望·勃仑在1829年10月2日写给美国驻马德里公使望·奈斯一封信，要他通知西班牙政府，“正如以前（巴拿马会议时期）防止了蓄谋已久的暴乱在岛上发生那样，另一次暴乱也是可以防止的”。②1830年10月13日，美国通过同一途径通知西班牙政府：“我们对于古巴保持现状感到满意，而不能容许把古巴转让给任何欧洲强国”。③

美国再三充当的这一维护西班牙、反对古巴

① «Memorias del General José Antonio Páez, Autobiografia», Biblioteca Ayacucho, Madrid, p. 455—456. （《何塞·安东尼奥·派斯将军回忆录，自传》，阿亚库乔图书馆，马德里版，第455—456页。）

② 岁德里盖斯：上引著作，第85—89页。

的角色，在十年后，即1840年达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美国的目的一向是要消除英国的危险。望·勃伦总统的国务卿福西斯，1840年通过驻马德里的代办阿龙·万斯，向西班牙政府表示[4]："授权阁下向西班牙政府保证，一旦发生任何企图夺取西班牙的这块领土的尝试，不管来自何方，西班牙都可指望得到美国陆、海军的援助，使它收复该岛并保持其统治。"

8

当古巴致力于争取独立的1848年运动时，美国第一次决定（虽然是短暂的）放弃对古巴的"熟

---

③ 罗德里盖斯所提出的文件，引自：«Executive Document núm. 121: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32nd. Congress, lst. Session, Island of Cuba. Massage from the Presidente of the U. S. in reference to the Island of Cuba», Ag. 31. 1852, p.19－26. (《众议院施政文献一百二十一期，第三十二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古巴岛。美国总统关于古巴岛的咨文》，1852年8月31日，第19—26页。)

④ 《众议院施政文献二十一期……》，第35－37页。

果政策”，——即耐心等待事变发展使古巴自然地落入美国之手——而倾向于迅速占有古巴。为此，美国总统詹姆斯·诺克斯·蒲尔克和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在其对墨西哥推行的扩张主义计划得逞的鼓舞下，[1]决定以收买的办法占有古巴，并通过外交途径将这一决定通知西班牙政府。但是西班牙大臣会议主席腊蒙·马里亚·纳尔伐斯将军和国务大臣佩德罗·何·皮达尔，口头通知美国驻马德里公使桑德斯说：西班牙既不愿意这个岛屿脱离西班牙，也不害怕未来的革命危险，因为西班牙有办法消灭它们。美国未再坚持自己的建议，而采取了支持西班牙，反对古巴独立的顽固态度，为了安慰西班牙，布坎南公开声明：“美国政府绝不参与煽动古巴人不满的任何活动……我们由衷地希望，在古巴不发生任何叛乱。即使不幸而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也决不是因为美国政府没有对

① 1835年，美国策动墨西哥属地德克萨斯的独立运动。1845年，“宿命论”者蒲尔克任美国总统，这一年美国正式并吞德克萨斯。次年，蒲尔克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又占领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译者注

它的友好国家履行自己的责任。”①

9

不可能一一叙述美国对古巴的既定政策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我们在最近出版的《古巴和美国：1805—1898 年》一书中，对此作了详细而广泛的研究。这是一部记述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对古巴独立采取截然相反态度的历史文献。我们只需说明一点：早在古巴人争取自由的初期愿望刚刚显露时，美国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而且对立的态度。人民是坚决、勇敢地支持古巴的愿望；政府和官方的态度则是冷淡的、自私自利的，拒绝、阻挠和反对任何对古巴解放事业的支持和参与。这就是美国对待古巴一贯的真实态度，实质上这也就是美国对拉丁美洲其他人民所采取的一贯态度。

一方面，那些高尚的人们——有普通人民的

① 《众议院施政文献二十一期，第二十三届国会，第一次会议，古巴岛……》。

子弟；有地位很高的人；有高级或低级官员、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利用自己的职位，为支持古巴而热情奔走，但这些努力从来得不到任何效果，因为一进入决定性的官方范围之内，一到美国政府或国会手里，不是被一笔勾销，就是被大大打了折扣。还有一些坚决勇敢的美国公民，参加了古巴革命者远征队来到古巴，在杂草丛生的旷野中，同克里奥尔人一道，为古巴的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它对这罄竹难书的战斗史诗，袖手旁观，默不作声，小心谨慎，生怕招惹是非，甚至不承认这些争取自由的勇士们为战斗的一方；有时公开反对任何解放的企图，甚至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持西班牙，帮助它保持或恢复统治（如果失去的话）；扼杀美国公民热情支持古巴人民自由事业的高尚计划，阻挠和破坏这些计划的实现。

根据西班牙驻华盛顿公使所收集并转报本国政府的情报，人民支持古巴独立的最初迹象是1841年才出现的。从1848年起，人民的这种愿望通过纳尔西索·洛佩斯[1]才明朗地表现出来。一

直发展到许多美国公民参加远征队，在古巴登陆，为古巴的自由而斗争，为古巴而捐躯。特奥多罗·奥哈腊为了同纳尔西索·洛佩斯联合，不惜辞去他在美国军队中的上尉军职；特奥多罗的名字以及那些乘坐“克雷奥莱号”、“威廉·皮塞号”、“乔奇阿纳号”、“苏赛·劳德号”、“克莱奥巴特腊号”、“潘培罗号”等船只，参加纳尔西索·洛佩斯远征队的美国公民的名字（他们中许多人为古巴的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正象古巴解放革命的先烈和同美国公民在一起斗争的古巴先驱者的名字一样，应当永远受到我们的尊敬。

但是早在人民支持古巴的行动出现之前，美国官方已经表现出反对古巴独立的态度。第一次是在1826年，美国政府反对波利瓦尔准备在巴拿

① 纳尔西索·洛佩斯（Narciso López），1798或1799年生于委内瑞拉。1841年参加古巴革命起义密谋，1849年逃至美国，以后连续发动三次远征。第一次（1849年）被美国当局所阻；其余两次（1850年5月，1851年8月）均从新奥尔良出发抵达古巴，但都失败。洛佩斯本人及其同谋者多人均被捕处死。对于洛佩斯这个人，从来史家对他的评价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此人同古巴土生白人奴隶主有密切联系。他的几次远征，均得到了美国南部奴隶主的支持。——译者注

马会议上进一步阐述的支持古巴自由的计划。以后，在1830年，美国国务卿望·勃仑通过驻马德里公使望·奈斯，通知西班牙政府，“对于古巴保持现状”表示满意；①到1840年，美国政府毫无顾忌地表示愿为西班牙提供“美国陆、海军的援助，使它收复该岛并保持其统治。”②

1849年，美国总统萨克里·泰勒发表声明，对纳尔西索·洛佩斯在美国进行的战斗准备作了如下的评论：“在美国国内，策动和准备的旨在侵犯一个友好国家领土的计划，是一桩严重的罪行，因为它危害了这个国家的和平并损害了民族的荣誉”。他号召所有美国人“不参与上述计划并采取一切合法手段加以谴责和阻挠。”③这个声明以及为实现这个声明而采取的措施，使“圆

① 见第115页注③。

② 见第115页注④。

③ F. H. Claiborn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hn A. Quitman, Major General U. S. Army and Governor of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New York, 1860, tomo I, p. 56—57. (克莱庞:《美国陆军少将和密西西比州州长奎特门的生平及其通信》，1860年纽约版，第1卷，第56—57页。)

岛"[1]远征遭到了失败。

1851年，当纳尔西索·洛佩斯将军协同一些古巴人和美国人，为组织一次新的支持古巴的远征而继续工作时，又一次遭到以美国总统米拉德·费尔摩和代理国务卿狄立克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干涉。美国政府于4月25日发表声明，说这些革命工作是"反对一个友好国家的敌对犯罪行为……　这些策划应受到谴责，进行这种策划就是滥用他们所受到的殷勤招待，是对允许他们在这个国家避难而免受本国迫害的恩惠的赤裸裸的忘恩负义行为……这些远征只能被认为是盗匪的冒险行径，不仅应受到文明世界的谴责，而且是侵犯人权，违反明文禁止这样做的我国法律的行为。"[2]根据这些情况，他们警告所有参与争取古巴独立工作的人，迅速放弃这些工作，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处，并被剥夺要求政府保护的权利"；

---

① 圆岛(Round Island)，在美国新奥尔良附近。——译者注

② «Executive Document 2,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32nd. Congress, Ist. Session»。(《众议院施政文献之二，第三十二届国会，第一次会议》。)

要求他们“脱离这些组织并谴责这种行为，采取一切合法手段阻止其实现。”就这样，古巴人的努力以及新奥尔良、基韦斯特、莫比耳、路易斯维尔、辛辛那提、匹兹堡、巴尔的摩和费拉德尔菲亚的美国市民决心采取并且争取美国政府也采取有效行动支持古巴自由的高尚愿望遭到了挫折。

10

鉴于纳尔西索·洛佩斯和在美国的古巴人一再进行反对西班牙对古巴统治的革命尝试，同时看到美国政府一再声明坚决反对这种革命，西班牙政府很想在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下，永远取得和平占有古巴的正式保证，因此，英法两国的公使，于1852年4月23日分别向美国费尔摩总统提出一项协议草案，草案规定三国都放弃占据古巴的意图，并保证制止任何独立的尝试。对此建议，国务卿韦勃斯特未予答复，就于10月24日去世了。他的继任者埃弗雷特，在12月1日虽然作了答复，但拒绝在古巴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也就是

说，美国在这方面，要保有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行动的自由："任何一届美国政府，如果与欧洲大国达成这样的协议，即在将来任何时候以及任何情况下，无论是通过与西班牙达成的友好协议，还是通过合法的军事行动（如果战争的灾难一旦不幸发生），无论是在古巴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如果他们按照本大陆原属西班牙的其他国家的榜样取得独立的话），还是出于其他任何理由，那怕是由于保存自己的最迫切需要，美国永远不得占有古巴。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末，不管这个政府拥有多大的舆论支持，它都要遭到普天之下千万人的憎恨，而一天也不能存在下去。"①

11

皮尔斯总统的国务卿马尔锡（William R Marcy），利用美国驻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的公使于1854年策划了一个巧妙的政治阴谋，美驻三国公使曾在10月9日、10日、11日在奥斯坦

① 罗德里盖斯：上引著作，第171页。

德召开的、其后又于12日至18日在埃斯拉沙伯[①]继续举行的所谓“奥斯坦德会议”上，商讨向西班牙购买古巴的问题。18日，美国公使向他们的上司——国务卿提出的报告中，吹嘘购买古巴的好处，公开暴露了美国对古巴的野心。他们说：“如果我们以超出它本身价值的高价[②]向西班牙购买这个岛屿而遭到拒绝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考虑古巴在西班牙统治之下是否危及我们国内和平和我们亲爱联邦生存的时候了。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末我们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这个岛屿（如果我们有办法这样做的话），无论是出于神权或人权的考虑，都是合理合法的。正象邻居失火，无法扑救，眼看要烧到自己头上时，允许把他家的房子推倒一样，我们的做法正是根据同一个原则。……假如我们允许古巴仍旧回到非洲人手里，或者变成第二个圣多明各，我们就没尽到自己的职责，就不

---

① 奥斯坦德（Ostende），是比利时北部濒临北海的一个城市。埃斯拉沙伯（Aix-La-Chapelle）即亚琛（Aachen），在今之西德境内，靠近比利时边界。——译者注

② 在“奥斯坦德会议”上，美国曾打算以一亿三千万美元向西班牙购买古巴。——译者注

配做我们英勇先辈的子孙，也就对后代犯下了不体面的叛逆行为。”①

这些公使恰好表达了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对古巴的想法，因为美国国务卿早在4月3日就曾对其中一位公使苏勒②说："古巴同美国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我们的政体之下，这种联系将保证岛国人民享有我们政治制度的好处，如果让古巴人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可以预料他们是愿意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一有适当的机会，总统就会命令阁下重新进行购买古巴岛的尝试……如果西班牙认为把古巴卖给外国的建议有伤其国体而恼羞成怒(事实上的确如此，西班牙因恼怒而未接受这一建议)，也有可能诱导它同意古巴的独立，而促成这一结果主要应靠美国”。③ 1902年，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

---

① «The works of James Buchanan», Filadelfia, 1909, vol. IX, p. 260—262.(《詹姆斯·布坎南文集》，1909年费拉德尔菲亚版，第9卷，第260—262页。)

② 苏勒(Pierre Soulé)，是当时美国驻西班牙的公使。——译者注

③ «Marcy Papers», vol. 49.(《马尔锡书信集》，第49卷。)

12

布坎南就任美国总统后，从1857年起，继续进行购买古巴岛的活动，① 他在这一年12月8日和第二年12月6日的咨文中，都对此做了公开的申述；后来又把它提交给众议院和参议院，建议通过一条批准购买古巴计划的法令，并且授予总统进行谈判所必要的一切手段，然而并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南北战争就把古巴问题搁置起来了。

13

1868年10月10日，伟大的三十年解放战争

① 布坎南在继皮尔斯就任美国总统之前，是美国的驻英公使。他的就任总统，同他忠于《奥斯坦德宣言》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在评论《奥斯坦德宣言》和这个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时指出：**"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同在对内政策上一样，奴隶主的利益成为指路的星辰。布坎南事实上是靠了发布奥斯坦德宣言才弄到总统一职的，这个宣言宣布，用购买办法或用武力夺取古巴，是国家政策的伟大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351页。）——译者注

(1868—1898年)第一阶段(1868—1878年)战斗爆发了,美国人民群情激昂,表示坚决支持古巴的事业。在1869到1870年间,到处组织俱乐部和委员会,集会和会议,到处发表宣言,报刊刊载文章,送交国会的请愿书达十二封之多,其中一封有宾夕法尼亚州四千一百一十三个美国公民的签名,另一封有纽约州七万二千多个美国人的签名,纷纷表示声援古巴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保卫古巴的解放事业。但是,一如既往,美国政府对人民的呼声毫不理会,也没采取任何支持古巴解放斗争的行动,政府和国会,甚至没说一句援助和同情古巴革命者的话。古巴革命者的特使何塞·摩腊莱斯·莱墨斯从美国总统乌利赛斯·辛普逊·格兰特那里得到的只是诺言,是根本没有兑现的空洞的诺言。格兰特内阁中的一位最著名人物,国防部长劳林斯(John A. Rawlins),是古巴解放事业的坚决和热情的支持者。他曾促使美国总统签署一项中立声明,承认古巴为交战一方。直到临死之前,他还托付内阁中的一位同僚克雷斯维尔①

① 克雷斯维尔(John A. J. Creswell),自1869年起曾在格兰特政府内担任邮政部长的职务。——译者注

关心“目前正在战斗着的不幸的古巴”。并恳求他说：“我希望您给予大力协助，古巴必须获得自由。必须消灭古巴残暴的敌人。共和国对此是责无旁贷的。我们曾为此而共同奋斗。”① 劳林斯的这些奔走和建议毫无结果。古巴革命者的头号敌人美国国务卿海密尔顿·费西1868年一笔勾销了劳林斯所作的可贵的努力，非但没有声明古巴为交战的一方，而且使格兰特总统在1871年10月12日发表了另一个声明②，这一声明在攻击古巴革命者、损害古巴革命事业方面大大超过了泰勒和费尔摩两位总统所做的一切。在文件的前三段（“原因”部分），公开而严厉的谴责了所有进行或准备进行军事策划或远征、反对与美国和平相处的大国的占领和统治的“图谋不轨”分子的行为——无论违法者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说破坏中立法的行为使罪犯受到了全体正直的守法公民的谴责。在最后的“结论”部分，美国总统格兰特说：

① «The New York Herald», Septiembre 8, 1869.（《纽约先驱论坛报》，1869年9月18日。）

② 罗德里盖斯：上引著作，第230页。

“我现在宣布，凡有无视国家主权，以上述或类似行为违反美国法律者均需严加惩处；一经判决，坚决执行，本政府绝不给予宽恕。我训令并要求政府所属各民政和军事当局，在自己职权范围内，采取一切手段，务必将违反使我对各友邦负有神圣义务的法律的上述罪犯，加以逮捕法办。”

这样，美国政府通过费西和格兰特，把十年战争中的古巴革命者和所有支援古巴独立事业的人说成是：“图谋不轨分子……应受到法律严厉制裁的罪犯……由于他们的罪行，而受到了全体正直公民的谴责”。美国政府就这样完全取消了纽约古巴侨民委员会的活动，并且完全拒绝对那些为了自由和正义而正在岛国进行斗争和流血牺牲的古巴人给以声援和保护。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过去如此，今后也始终如此。

14

1871年，美国政府一面执行臭名昭著的“熟果”政策，希望事件的发展——偶然事件或骚乱，能使古巴岛落入自己手中，却同时对一家美国辛

迪加为西班牙提供贷款的计划，给予官方的支持。这一计划有利于加强美国在古巴的实力，便于美国资本的渗透，用一条难以挣脱的外债锁链，束缚西班牙政府的手脚。

为了占有古巴，华盛顿和华尔街以贷款作幌子，进行了一笔以一亿五千万比索收买古巴和波多黎各诸岛屿的交易，这是它们第一次的勾结。但这一次金融政治的交易并没有得逞，然而却又一次证明了美国反对古巴自由的行动路线是至死不变的。

两年以后，即1873年，古巴远征军的轮船“弗吉尼斯号”(Virginuis)被截，船上的古巴和美国船员中不少人遭到杀害。格兰特和费西虽然知道这次野蛮的屠杀，但既没有加以制止，也没有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只是在经过长时期的外交谈判之后，同意接受该船以及未被杀害的船员的移交，而事先并未弄清该船的国籍，尽管船上挂着美国国旗。美国驻马德里外交代表西克尔斯数年之后为解脱他对“弗吉尼斯号”事件的责任，曾断言：“美国的政策是举棋不定的、软弱的，它给了西班牙一种印象，觉得我们很怕事。”美国的态度，恰好同当

时停泊在圣地亚哥港口的英国巡洋舰“尼奥勃号”船长伦布顿·劳兰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是由于他的果断、英勇和人道主义精神才使“弗吉尼斯号”上的船员和乘客幸免全遭杀害。

但是，这并没有能阻止美国公民在三十年战争的第一阶段和后来在1895至1898年间，背井离乡，放弃他们的个人利益，为古巴的独立而斗争。托马斯·约旦①和亨利·姆·里夫(英国人)这两位著名人物的例子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在古巴革命军中，他们一直提升到总司令和准将的军阶，最后为古巴的自由洒尽了鲜血。

15

如果说到1871年止，美国为了兼并古巴曾进行过各种尝试的话，那么根据约翰·昆西·阿丹姆斯9月27日日记的记载，古巴合并主义的第一次提案，是1822年提出的。提案人是一位桑

① 托马斯·约旦(Thomas Jordan)，是一位曾参加古巴十年战争的美国将军，他曾接替马努埃尔·德·盖萨达(Manuel de Quesada)将军领导解放军。——译者注

切斯先生，此人究竟是谁，并不清楚。当时门罗总统和他的内阁拒绝了他的要求。阿丹姆斯宣称，在这个问题上门罗总统主张不顾古巴人的死活，要使美国保有完全的自由，以便在适当的时机美国独自行动，而在当时避免同西班牙或英国发生纠纷。

主张古巴合并到美国的倾向，是同古巴岛上反对西班牙专制政权的斗争同时出现，人们认为这是最迅速获得宗主国拒绝给予克里奥尔人的公正和自由和流血最少的一个手段。但是这一倾向渐渐失去了人心和力量，因为古巴人逐渐明白，即使以牺牲政治地位为代价，从美国那里，也绝对得不到公正和自由。

这一合并倾向的明证就是，卡洛斯·塞斯佩德斯以及古巴革命领袖们分别于1869年1月3日和4月6日向格兰特总统请求援助推翻西班牙对古巴岛的统治，并加入北美合众国作为新的一州。

由于桑洪和约，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古巴和美国拥护合并主义的倾向重新抬头。1889年3月16日，费拉德尔菲亚的报纸《制造者》(The Manufacturer）发表了一篇由共和党领袖们执笔的文

章，题为《我们要古巴吗?》，文章透露，有人坚决主张，“现政府应严肃考虑敦请西班牙把古巴岛出售给美国的提案。”

除上述美国保护贸易主义的喉舌的意见外，还有反对派代表《纽约晚邮报》的意见。它并不是为并吞古巴而辩护，而是用保护贸易主义者同样的理由对兼并主义进行攻击。这家报纸力陈黑人的危险，并认为兼并古巴是“一种惩罚”，而这一惩罚“由于西班牙拒绝出售古巴使我们有可能得以避免”。

1889年，美国政治上的这两种流派，就是以这种侮辱性的态度来看待我们古巴人的。

何塞·马蒂对这两种流派进行了激昂慷慨的反击。他在这一年3月25日的《纽约晚邮报》上发表了一封题为《为古巴辩护》(Vindicación de Cuba)的信，驳斥了某些报纸对古巴人的“侮辱性攻击”。马蒂说，“没有一个正直的古巴人，会屈辱到这种地步：仅仅由于自己土地的价值，而被一个抹杀他的才能、污辱他的品德、轻视他的人格的民族，当作道德败坏的人来接纳。”马蒂捍卫了古巴人，反击了美国粗暴恶意的责难，强调指出古巴

的痛苦、牺牲以及对西班牙专制政权的抗议和反抗。马蒂对美国佬进行了严厉的申斥："人们不应当宁看着我们为争取自由而死在他们的门口，也不肯为帮助一个自由民族的新生而抬一下手或说一句话。你们只是在尊重西班牙的前提下，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来没有抬过一下手，也没说过一句话。"

16

在签订桑洪和约和发动最后一次独立战争之间这一段古巴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即1878年至1895年，在古巴发生了许多对岛国命运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事件，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取代西班牙而成为古巴经济上的宗主国。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古巴地理位置的致命特点——古巴国土邻近美国——以及古巴资源的丰富，不仅由于当时已锋芒毕露的美帝国主义的扩张野心，也不仅由于自1805年以来美国一再企图占有这个岛屿，而且由于西班牙政府的一系列错误和它的愚蠢无能。到1895年革命斗争再度燃起时，古巴

已经完全成为美国经济上的殖民地。在适当的时刻，采取对美国利益适宜的方式，从西班牙的手中夺取对古巴的政治统治权，现在已完全操纵在美国统治者手里了。

马蒂熟知古巴的这种经济地位，同时也深深了解美国自1805年起蓄意并吞古巴的一贯态度。他在发动反西班牙战争时，十分小心不使美国参加进来。这样做，尤其是因为他不但要使古巴和波多黎各得到独立，而且要把古巴变为阻止美帝国主义向安的列斯群岛、向美洲和全世界扩张（这一点他预见到了）的屏障。

马蒂对这一点始终坚守不渝，他给自己的同胞留下了充满智慧和爱国思想的忠告与教导，成为革命和共和国的宝贵遗产。马蒂追求的目的，是使革命依靠古巴人自已的力量得到发展，建立共和国，使共和国巩固和壮大，消除那些妨碍甚至影响到无法充分行使政治主权的经济障碍。

安东尼奥·马塞奥、马克西莫·戈麦斯和卡利斯多·加西亚，在这些问题上与马蒂是完全一致的；在他们身上体现了鲜明的反帝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可以称呼他们为 1895 年古巴解

放战争的四位伟人。

17

早在解放战争爆发之前，古巴人重又遭到美国的敌视。现在代表美国的是格兰弗·克利夫兰总统、国务卿理查·奥尔尼以及他们的同盟者——向古巴投资的资本家。他们反对给古巴独立事业提供任何帮助或保护——无论是提供派遣远征军的方便条件，还是宣布古巴为交战一方，承认古巴革命。相反，由于他们实行有利于西班牙的中立政策，对这一切要求进行官方的迫害。克利夫兰和奥尔尼一向追随西班牙，甚至按西班牙政府的政策行事，对西班牙政府的军事计划提供援助，同时企图促使古巴岛在西班牙的统治下实行绥靖。

美国政府这种反对古巴的态度，愈益暴露出来，因为它是和美国人民慷慨支持古巴独立的感情和要求针锋相对的。

美国总统在12月2日的年度咨文中，虽然承认古巴革命的强大力量，承认它“比1868年至

1878年间更为活跃……而且势在蔓延”，承认古巴人民“看来正在为争取更大的自由而斗争”，承认“当看到这场凶恶的流血战争的残酷性质时，我们人类的情感产生一种恐怖印象”，但却又一次向西班牙作出庄严的中立保证，并表示“美国政府决心忠实地履行其全部国际义务”①。这实际上等于公开地站在西班牙一边反对古巴。

在自东向西胜利进军的“突进”战役期间及随后的古巴解放革命大发展时期，日益显示出古巴革命领袖们的卓越才能，暴露出西班牙的镇压手段——军事扫荡和魏勒推行的集中农民的野蛮法令——已完全无效。与此同时，同情一切崇高的美好事业的美国人民，越来越表明他们与古巴人民是同呼吸共患难的，他们举行群众大会，发表声明和演说，致函克利夫兰总统和国会，呼吁立即宣布古巴为交战一方并承认古巴共和国。美国总统对这些呼吁完全置若罔闻，无动于衷；相反，他只听信利益集团的意见，关心银行家、实业家和投资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1895, vol I, p. XXXII.（《美国的外交关系》，1895年华盛顿版，第1卷，第32页。）

者的要求。

奥尔尼1896年4月4日向西班牙驻华盛顿外交代表递交的一件备忘录，可以作为克利夫兰和奥尔尼蔑视本国舆论的一个雄辩例证。备忘录虽然承认“革命的迅速扩大和发展”以及解放军的“纪律性”，但却诬蔑解放军是“叛乱分子”、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者，说他们的胜利只可能是“建立一个白人共和国和另一个黑人共和国”；因而声明不能承认古巴人为交战的一方，最后建议“同西班牙合作，以便在既保留西班牙统治权，又使岛上的人民取得作为合理要求的属于地方政府的一切职权和权利的条件下，立即实现对古巴的绥靖。”①

愚蠢的西班牙政府拒绝了美国的斡旋之后，美国转而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静待古巴人和西班牙人在它垂涎已久的邻岛上两败俱伤。许多美国公民提出的要求承认古巴独立，至少声明古巴

① 这里所采用的西班牙译文，按照杜普·德·洛梅在4月10日给西班牙国务大臣的公函中的说法，“做到了尽可能逐字把它译为西班牙语”，载«Documentos presentados a las Cortes en la Legislatura de 1898 por el Ministro de Estado»（《西班牙国务大臣向1898年立法议会提出的文书》），1898年马德里版，第1—8页。

解放革命军为交战一方的呼声完全落空了。

奥尔尼的备忘录，又一次暴露了美国政府的意图，即不希望在美国尚不宜于占有古巴或古巴尚未落入美国之手以前，古巴摆脱西班牙的统治。它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在古美关系史中重复不下千百次的事实，即一方面，美国的确有着不少无私地关怀古巴命运的值得敬佩的国民，其中有些人甚至不惜为古巴的自由面流血牺牲，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从未支持过古巴的独立，而且一贯阻挠、打击和挫伤美国公民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奥尔尼提出他的备忘录，是希望古巴仍然属于西班牙，他认为如果向古巴人保证，他们在西班牙统治下，可以享受"作为合理要求的属于地方政府的权利"，古巴人将停止武装斗争。

美国深感忧虑的是：在古巴革命者的冲击下，西班牙可能在战争中失败，而不得不放弃这个岛屿。奥尔尼认为，古巴革命者比以前更加强大更加有训练了。他对杜普·德·洛梅说："令人担心的是西班牙已无力继续进行战争，而不得不放弃这个岛屿，把它交给目前正同西班牙兵戎相接的各个种族的乌合之众。对战争的这种结局，即使是

古巴最亲密的朋友和人民政府最热心的辩护者，也不能不怀有戒心。有充分的理由使人担忧，假如西班牙退出这个岛屿，目前存在于暴乱者各派系之间团结的唯一联系就会随之消失，一场种族战争就会突然降临。他们在叛乱中锻炼得越有纪律和越有经验，这场种族战争就越残酷。即使暂时取得和平，那也只能是建立一个白人共和国和另一个黑人共和国，即使它们在开始时同意瓜分整个岛屿，但从第一天起，它们就会变成仇人，直到一方把另一方征服为止，绝不会罢休。”

正是由于美国害怕古巴革命者会取得胜利，害怕这个胜利将有损美国的利益，所以它才在1896年向西班牙进行斡旋，为的是使西班牙不致失去古巴岛。

西班牙统治者对备忘录提出的建议，竟置若罔闻，卡诺瓦斯甚至没有把它提交国会。他们继续推行打到“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丕塞他”的灾难性政策，并且从这一年2月10日起任命巴莱里亚诺・魏勒为总督，把这个精力有余、计谋不足的人物，看作是执行这一政策的一员干将。

1896年2月10日，魏勒一坐上总督府的宝

座，就采取了激烈的措施和非人道的集中营法令，要把这个岛屿夷为平地。在美国，要求干预这场冲突以制止在它门前发生的屠杀暴行的呼声响彻云霄，但都没有发生任何效果。

再次呼吁美国政府承认古巴为交战一方的请求，没有得到理睬；要求承认古巴独立的呼声，更没有受到重视。

最后，克利夫兰在他 1896 年 12 月 7 日的最后一个咨文中，断然拒绝政府发表这样或那样的类似声明。他说美国政府坚决保持中立。无论是魏勒的屠杀政策或恐怖的集中营措施，在他都是无关紧要的。他并不认为有必要为了人道和文明，进行干涉和采取行动。他又一次谈到西班牙有可能给予古巴人以自治。他认为承认古巴独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要继续袖手旁观，等待……，等到何时？他提醒说："……当情况表明西班牙已无力镇压叛乱，它在岛上的统治实际上已经垮台的时候，再要为保住这个岛屿而斗争，势必成为无益的挣扎，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并使为之而战斗的岛屿破坏得荡然无存。到那时候，我们就要考虑，我们对西班牙主权承担的义

务，是否必须为其他更加崇高的责任所代替，对于这种责任，我们几乎是无法推卸，不能不履行的。”

这就是说：当骚动和混乱尚未严重地影响美国的利益、方便和需要时，美国不会加以干涉。

也就是说，在“形势没有因为意外事件发生根本变化”以前，美国不会干涉。

这就等于希望熟透的果子，自然落到坐在树下耐心等待的美国的手里。

18

1897 年 3 月 4 日，获胜的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就任美国总统。他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这一纲领于 1896 年 7 月18日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通过），慷慨激昂地表达了当时群众和共和党领袖中支持古巴的舆论：“人们同情古巴。美国人民从获得自己独立的那一天起，就同情美洲其他各国人民为摆脱欧洲统治所作的努力。我们十分关切地注视着古巴爱国者反对暴虐和压迫的斗争，并衷心祝愿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获得完全的胜利。西班牙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古巴的控制，又

没有能力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和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将积极通过自己的影响，进行斡旋，以便恢复古巴的和平，使古巴获得独立。”

但是麦金莱却不知不觉地追随了他前任的政策，希望发生骚动和混乱，或者发生有损于美国人和美国利益的意外事件，以便使成熟的果子落到美国的手里。

在麦金莱政府给美国驻西班牙公使伍德福的指示中（1897年9月18日伍德福将美国政府的意见转达西班牙国务大臣特图安公爵），指出：革命排山倒海的气势就要摧毁西班牙的统治，已经使美国在古巴的投资和对古巴的贸易，发生了深刻的危机，因此，麦金莱决定进行干涉，希望获得“一个和平而持久的、对西班牙和古巴人民同样公正而体面的结果。”并向西班牙提出“愿在现在和将来进行友好斡旋”。[①]

---

① «Documentos presentados a las Cortes en la Legislatura de 1898, por el Ministro de Estado», Madrid, 1898, p. 42, 48.（《西班牙国务大臣向1898年立法议会提出的文书》，1898年马德里版，第42、48页。）

由于在古巴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大事件——革命的胜利发展，魏勒的彻底失败，腊蒙·布兰柯将军接替魏勒并在古巴推行自治；由于古巴革命爱国者对独立和建立共和国以外的任何措施采取了毫不妥协的坚定态度，因而自治政策也宣告破产，——美国政府越来越违反人民的意志，加紧制定占有古巴的计划，越来越敌视古巴革命。尽管伍德福代表美国政府，向俄国、德国和法国驻马德里的外交代表提出保证，“美国不想兼并古巴，也不想在古巴建立一个保护国”，但在10月17日的公函中，这位深知麦金莱的想法和做法的外交官向麦金莱表示，他相信：“古巴的混乱，是西班牙政权……四个世纪以来倒行逆施的结果……叛乱是对西班牙统治方式唯一可能的反抗。”他对麦金莱说，他“正为着和平而工作……和平的恢复可能带来一个保护国，这是现实中合理的与可喜的结果”；但是他认为古巴人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律上的孤儿”……他说，“和平可能带来兼并——这是必要的最终目的，我希望兼并的实现是在古巴人学会管理自己的时候或者在那里已经有相当多的美国人停居下来足以形成一个牢固的有智慧

的公民基础的时候，而不是在这以前。”①

当美国人民要求承认古巴共和国的时候，麦金莱的并吞计划也最后完成了。

他在1897年12月6日在国会发表的咨文中表明了这一点。②尽管他宣称古巴革命已经特别高涨，魏勒的残暴以及寻求同西班牙和平解决的努力都不能阻止革命的发展，他仍然重申与西班牙友好，并坚决驳斥了说他的政府曾经支持古巴革命者在美国境内进行革命活动的指责，而强调指出："本政府不惜花费数百万美元，动员全部国家机器，为彻底履行国际法所规定的义务，作了一贯努力。”他的话，完全供认了美国政府曾经阻挠为古巴解放军运送军火的远征队离开美国，并使它得不到供应。他说："只要有一支远征军或一艘军用船只，在驶离我们海岸之前，因为违反我们的法律而被扣留，这就足以回答那些指责了”。

① 埃米尼奥·波台尔·比拉：《古巴同美国和西班牙的外交关系史》，第3卷，第324—326页。

② 我们这里所引用的，同前面几处一样，是《西班牙国务大臣向1898年立法议会提出的文书》中的译文。见该书第1卷第71—81页。

19

西班牙派腊蒙·布兰柯将军接替魏勒，并根据1897年11月25日的国王旨令，允许古巴自治，但已经太迟了！

岛上人心惶惶，一片混乱。1898年1月12日，哈瓦那街头发生骚乱，美国以此为借口，派“缅因号”战舰进驻哈瓦那。

意外事件发生了，起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1898年2月8日的《纽约日报》刊登了西班牙驻美国公使杜普·德·洛梅在1897年12月间写给何塞·卡纳莱哈斯先生的一封信的原文，信中讥笑美国总统“意志薄弱，庸俗低级，是个卑鄙的政客，既要把自己的后门打开，又要和他党内的好战分子和睦相处。”这封信是在何塞·卡纳莱哈斯先生住在古巴哈瓦那“英吉利旅馆”期间，被一个古巴青年古斯塔沃·埃斯柯多先生偷偷从他的办公室里拿走的。古斯塔沃·埃斯柯多先生把这封信交给了古巴驻纽约代表团的负责人卡斯蒂略，这封原信又寄给了美国总统麦金莱。杜普·

德·洛梅先生承认这封信是他写的；西班牙为了讨好华盛顿，撤掉了他的职务。第二个原因是2月15日“缅因号”发生爆炸，造成二百六十六名船员的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军官。

3月25日，麦金莱总统向西班牙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西班牙立即同古巴革命者停战，停战期限至10月1日止，以便通过美国的友好斡旋，与古巴革命者进行和平谈判，并要求西班牙废止关于集中农民的法令。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古巴恢复和平，同时还表明美国并没有吞并古巴的野心。最后通牒的实质部分，即关于停战部分，遭到了西班牙政府的拒绝，仅仅由布兰柯将军在30日颁布了一个停止集中农民的命令。

4月11日，美国总统决定要求国会授权，“采取措施，全面和彻底地结束西班牙政府与古巴人民之间的战事，保证在岛上建立一个能够维持秩序并执行国际义务的稳定政府，以巩固和平与安宁，保障古巴和我国公民的安全；并在必要时使用美国的陆海军力量，以实现上述目的。”①

在上述咨文的前几段，麦金莱不仅公然拒绝

① 见《西班牙国务大臣向1898年立法议会提出的文书》。

承认古巴的独立和古巴革命政府，而且拒绝承认古巴解放军为交战的一方，因为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就会使美国陷于被动，并给它带来实际的危险。”他明白表示，美国必须完全保持主动，以便在古巴问题上，能按照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和时机行事。他认为，承认古巴共和国，“对于美国参与谋求岛上和平，并不是必要的”。他接着说，“今天迫使美国去承认古巴的任何一个政府，将使我们对这个政府承担复杂的国际义务。一旦需要进行干预，我们的行动就必然要受到该国政府的约束，我们势必要听从它的指示，使我们处于一种纯属友好盟国的关系中。”

20

尽管在这个时期，美国公众舆论是公开支持古巴自由的，然而我们又一次看到美国政府对人民大众的感情和意志的约束和限制。因此，当咨文提交国会的时候，许多议员同声反对，因为咨文对支持古巴独立只字未提。在参议院里，马立恩·勃特勒参议员立即提出一个联合决议草案，

承认古巴共和国为一个独立国家；在众议院，虽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建议，但有两位众议员——伦茨（John J. Lents）和贝莱（Joseph W. Bailey），主张承认古巴的独立。

美国国会在古巴问题上所作出的最后决定是什么呢？

1898年4月16日，参议院通过了上述联合决议草案，宣告古巴人民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并承认战斗中的古巴共和国为这个岛屿的合法政权。

但是，当众议院研究参议院所通过的这一决议时，对它作了修改，只保留了第一部分，而把承认古巴共和国的第二部分整个删掉。接着任命了一个由参众两院议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委员会表示同意众议院的观点。这个观点，最后在国会中占了优势，由此产生了1898年4月18日的“联合决议”，20日得到美国总统的批准。

21

“联合决议”在美国对古巴的传统政策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恩立克·盖·卡尔博在他的《普拉特修正案的由来》一文中认为，“它类似美国对古巴的传统政策中的一条曲线，一条改变美国政策的曲线”。[①] 腊米罗·盖腊则认为，正好同普拉特修正案相反，“联合决议”反映了美国人民对古巴的友好感情和帮助古巴的愿望。他还说，“通过决议的那天，美国人民既没有想到什么帝国主义，也没有考虑任何必要的防御，他们在承认古巴人民是自由和独立的、并且有权利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时候，对古巴人民世世代代争取祖国独立和自由的努力，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这种努力同贲克山或约克镇[②] 的

① «Génesis de la Enmienda Platt». En Sociedad Cubana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Anuario de 1926, La Habana, 1926, p. 582.（《普拉特修正案的由来》，原载古巴国际法学会1926年年鉴，1926年哈瓦那版，第582页。）

② 贲克山（Bunker Hill）和约克镇（Yorktown），都是美国独立战争时发生重要战役的地方。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不久，新英格兰军队于6月间偷袭驻在波士顿查理士顿镇的英军。华盛顿在附近的贲克山和英军展开恶战，英军损失很大。这就是著名的贲克山之役。约克镇则是弗吉尼亚的一个小镇。1781年，美、法联军包围约克镇。当时英军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于同年10月向美军投降。从此以后，在北美大陆作战的英军斗志涣散，再无力量发动新的攻势，因此，约克镇一仗是美国在独立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战役。——译者注

光荣和英雄史迹相比，都是毫无逊色的。……那一天是洋溢着高尚和诚挚友谊的一天……'联合决议'是人民的声音——上帝的声音"。①

虽然如盖·卡尔博所说，"联合决议"同美国自1805年以来对古巴的一贯政策——这一政策我们在本书中已作了概括的论述——相比，可以把它看作是这个政策的一条曲线；但是，如果我们从它所产生的时机去加以研究的话，就会更清楚地看出，它只不过是这条既定的政治路线的又一次证明而已。它是美国政府在人民坦率而坚决地表示支持无条件地和毫不含糊地承认古巴的独立、承认革命政府为古巴共和国的合法政府的时刻，愚弄美国人民的把戏。因此，"联合决议"绝不象腊米罗·盖腊所宣称的那样，是人民的声音，而

① Ramiro Guerra y Sánchez, «En el Camino de la Independencia. Estudio histórico sobre la rivalidad de los Estados Unidos y la Gran Bretaña en sus relaciones con la independencia de Cuba», con un apéndice titulado «De Monroe a Platt», La Habana, 1930, p. 205. (腊米罗·盖腊一桑切斯：《在独立的道路上——关于美英在对古巴独立的关系中的斗争的历史研究》，有附录，题为《从门罗到普拉特》，1930年哈瓦那版，第205页。)

恰恰相反，它是对人民意志的欺骗，是美国帝国主义政治集团的声音。"联合决议"再一次证明，如果说在美国，在任何时期，都有公民慷慨而无私地同情古巴的独立，那末，美国政府则相反，它即使在已经形成了支持古巴自由的舆论的上述特殊情况下，也仍然阻挠人民的愿望得到实现，反对承认古巴共和国，企图把共和国的成立推向未来。

的确，"联合决议"中曾经宣称"古巴人民是自由和独立的，并有权享有自由和独立"，并且宣布美国除为了恢复古巴和平的目的外绝无在该岛行使主权、管辖权或干预古巴政府的任何意图或野心；并决意一俟该地秩序恢复，即将该岛的控制和管理权交还古巴人民。[①] 但是必须记住参议员培根在1902年6月27日讨论所谓普拉特修正案时所明白阐述的关于这一声明的真正意义。据他透露，促使美国议员作出包含在"联合决议"第一和第四条中的庄严声明的并不是什么同情心，而

① "联合决议"(Joint Resolution)共有四条。这里所引述的，是第一条和第四条的内容。其第二条和第三条的内容分别为："美国有义务要求西班牙政府立即结束它在古巴岛上的统治，并从古巴撤走陆海军"；和"美国总统有权使用美国的全部陆海军力量，以确保本决议的执行"。——译者注

只不过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为了消除美洲国家，而主要是欧洲国家可能抱有的疑虑的需要，这个疑虑就是：美国一旦向西班牙宣战，就会进行一场旨在占据古巴的征服和扩张战争。

22

因此，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联合决议”第一和第四条的声明，只具有很有限的道义价值，而且随着我们对其利己动机的深入了解而愈益减少。这种利己动机在那时曾推动了许多议员，产生了美国政治“商品主义”的最暧昧的轶事之一；它证明，金钱和政治在美国，按照李嘉德·莱温森在他的著作《政治中的金钱》中的说法，是“同一个东西”。

我们且来看一看埃斯特腊达·帕尔马在1897年同纽约交易所的经纪人塞缪尔·琼尼先生所签订的一些协定。琼尼保证用支付三千七百五十万美元的办法，负责从美国政府和议员那里买得对古巴独立的承认。

下面就是这件案子的简述。关于它，我们将

来还要写一本书，其中将包括直接影印的古巴和美国的有关文献。

为了替古巴革命事业募集经费，特别是购置军火，战斗中的古巴共和国的全权代表托马斯·埃斯特腊达·帕尔马，由执政委员会授权，从1895年年中起，开始进行旨在发行公债并同美国银行家和商人商订贷款协议的活动。

公债是在1896年4月间发行的，总额为一千万比索，票面额分五十、一百、五百及一千比索四种，很快流向市面，但直到麦金莱就任总统以前，却不能达到预期的数字。麦金莱总统上台后，美国的银行家和商人们以为麦金莱会履行他在共和党竞选纲领中所提出的支持古巴独立的诺言（他的胜利是共和党所赐），因此，相信在政府和国会中，可以得到必要的担保，把他们的资本投到上述公债的购买上去。

为此，以麦金莱总统的挚友、纽约财务律师约翰·麦克考克和座落在纽约华尔街六号的“克里斯蒂·佛·琼尼银号”的塞缪尔·琼尼为首的一个“院外活动者协会”，同埃斯特腊达·帕尔马订立一个协议，于1896年8月5日由帕尔马（代表

古巴共和国）和琼尼签字，其目的是“促成向西班牙购买古巴岛的计划的实现”。麦克考克先生负责向美国政府请求，使它“同意担任调解人”，每月上半月从华盛顿国库领取关税总额的一半，根据公债到期的先后，悉数偿付债券持有人；此外，美国政府有义务通知西班牙，“这次战争必须以古巴岛的完全独立结束，并让它知道，美国有意以调解人的身分为实现上述目的而行动”。

埃斯特腊达·帕尔马保证，“一旦美国政府同意担任调解人并将上述事项通知西班牙政府”，他负责“把一张一亿五千万比索的债券证明书，交给设于纽约百老汇一二〇号的商业信托公司，公债的年息四分，作为存款，并受本协定规定的期限与条款的约束”。利息每周一付，本金分五十年偿清。这笔债款规定用于补偿西班牙因丧失对这个岛屿的主权所受的损失，支付因执行本协定而使用的各项费用，“并作为对琼尼先生及其合作者的劳动的酬报”。这些人保留“随意处置应得的上述债券之全部或一部分的权利”。假如古巴代表大会不加以批准，或西班牙军队在1897年10月之前不从古巴撤退，这个协定将宣告无效。上述期限后来

被改为同年11月1日。执政委员会在12月10日批准这个协定时，又把它延期至1898年6月底，并把公债的发行额增加到两亿比索，以便使古巴能偿付因革命而欠下的债务，并宣称新生的共和国无义务以古巴的财富支付西班牙所欠的债款，对于在古巴的外侨所遭受的因战争造成的损失与伤害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次谈判引起了国际的反响：美国和英国的资本家对此都感兴趣。根据这一年10月19日英国驻马德里大使德勒姆芒-沃尔夫给美国公使伍德福的通知，英国资本家曾抗议没有让他们参加这次谈判。伍德福在第二天就把这一情况转告麦金莱总统，并报告说，英国外交代表曾断定这次谈判的发起人之一是麦克考克先生，一位在纽约有很大声誉和很高地位的人物，“他同美国首脑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英国这种蓄意插手古巴事务的行动，而且又正好是在古、西、美、英四国关系史上最紧张的时刻，很自然地立即受到了美国外交代表的有力回击，他对他的英国同事说，他“不能相信会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在经过郑重的考虑之后，竟来干预古巴事务；

也不相信在美国，无论在富有的银行家中间，或在贫苦的市民中间，会有人容忍对古巴行政事务的任何集体的或政治的干涉。”

由于当时西班牙采取了绥靖措施——撤换魏勒、废止集中营法并实行自治，这次谈判面临失败的前景，在此情况下，“院外活动者协会”又提交埃斯特腊达·帕尔马另一协定。这个协定经后者和琼尼在1897年11月18日签字，于26日呈报执政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月27日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了这个协定，保证前一协定的主要代理人获得“为数达三千七百五十万比索的债券，如果独立问题获得解决，西班牙军队从古巴岛撤退，美国承认古巴共和国的主权，而这一切都无需对西班牙进行赔偿。假如预期的结果由于第一个协定而得到实现，那么这一协定将宣告无效”。执政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新的协定，“这一协议的确认，使他（措帕尔马）具有充分与足够的权力使协定正式成立并付诸实施。同时使他作为古巴共和国执政委员会的合法代表，能够利用被授予的必要与特别的权力履行协定中规定的责任”。

1898年5月12日，执政委员会派遣副总统

多明戈·门德斯·卡波特博士为特派代表，同美国政府接触，以便充分了解有关12月10日和1月27日批准的两个协定的情况，并采取他认为必要的措施。执政委员会在10月23日的会议上，讨论和通过了他所提出的报告连同1898年5月5日纽约会议纪要的原稿。那次纽约会议是由托马斯·埃斯特腊达·帕尔马召开的，他以古巴共和国全权代表的身分担任主席，出席会议的有何塞·萨亚斯、贡萨洛·德·盖萨达、何塞·埃米略·特雷、何塞·安东尼奥·贡萨莱斯·拉努萨、卡洛斯·伊·帕腊加和卡洛斯·伊·萨尔多诸先生。埃斯特拉达·帕尔马陈述了同塞缪尔·琼尼订立上述协定的经过。他还说，为了使琼尼先生便于"从美国政府获得对古巴共和国的承认"而同意给予的最后一次延期，到1898年5月2日已经届满，因此已通知琼尼，"鉴于古巴问题的现有形势，根据本共和国总统所作的决定，已决计不再给予新的延期。由于上述各协定的目标没有实现，它们当然应认为已经无效。"

但是琼尼先生和麦克考克先生坚称"鉴于古巴人民的独立已被承认，1897年11月18日协定

的目标已经实现，因此他们应当得到该协定所规定的报酬”。埃斯特腊达拒绝了这一要求，同时表示愿提供五十万比索，专门作为对琼尼先生的工作的报酬，“聊以酬答诸位先生对古巴事业所作的贡献”，但这并没有被接受。

鉴于这一情况，埃斯特腊达·帕尔马才将本案提交纽约古巴侨委会讨论。他说，虽然美国政府的确没有承认古巴的独立，也未承认本革命政府，“但是不可否认，当宣称古巴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独立的时候，古巴人的最高理想已经实现了。”他又说，“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琼尼先生的助手们所作的反复的努力，他们为了替古巴效力，付出了全部精力，全部影响和全部积极性，正象盖萨达先生① 所能证实的那样（他后来证实了这点），他有机会在华盛顿观察上述各位先生在该城市政界重要人物中进行活动的效果。在他看来，宣布‘古巴人民是独立的’声明以及使美国政府放弃一切并吞主义的意图与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这是不容否认的。”他最后认为，“必须同这些人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正是通

① 盖萨达当时是古巴驻美国代表团的秘书。——译者注

过他们才得以接近官方人士。”

纽约古巴侨委会一致认为，“尽管8月5日和11月18日的协定已没有约束力，在听了埃斯特腊达·帕尔马和盖萨达介绍的情况以后，下述各点是不容置疑的：琼尼先生以及与上述协定有关的他的朋友对古巴事业所提供的服务是宝贵的，他们在鼓动大家投票承认古巴人民的独立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国会决议所包含的声明，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奔走的结果；声明说美国政府不抱有任何并吞古巴岛的意图，并且声称一旦古巴恢复和平，即由古巴人民自己管理该岛；这一声明对于急切希望获得祖国独立的古巴人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些服务，毫无疑问，应按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服务人的身分，给予适当的报酬。同这些可敬的人物搞好关系，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一致同意将两百万比索的古巴共和国债券交付给琼尼先生和他的合作者，“作为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的适当报酬”，同时因为“支付这些债券将会产生一个作用，即使这些先生们乐于为承认古巴共和国而努力，以便使债

券获得实际的价值，因此，很自然可以希望他们用他们的支持和影响继续提供服务”。

在埃斯特腊达·帕尔马主持之下于5月5日在纽约召开的重要人士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于1898年10月10日经执政委员会批准以后，立即将相当于两百万比索的债券交付给琼尼和麦克考克先生，以酬谢他们最后使美国国会通过并使麦金莱总统于同年4月20日批准“联合决议”第一条所进行的活动。

古巴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债券的持有者向总统托马斯·埃斯特腊达·帕尔马要求兑现，后者把这件事提到了国会。

1月12日，参议院在秘密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意支付这些债券。众议院在19日批准了本案。总统在22日签署了一项法令，同日发表在官方公报上。法令说，根据宪法第一条临时条款，把古巴革命政府代表团在国外发行的公债，规定为合法的债券。这些债券先后于1896和1897年分两批发行。属于第一批的共二千七百九十三张，票面额为二百一十九万五千二百五十美元；第二批共二百零三张，票面额共一千二百三十五美

元。同时，授权共和国总统对已到期的债券和尚未到期的债券支付利息。

根据上述法令，财政部在2月份由部长何塞·姆·加西亚·蒙特斯和总统埃斯特腊达·帕尔马签署的第四十八号公告中，规定2月15日为向债券持有者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开始偿还公债的日期，时间是上午8至11时，下午1至4时，地点是国库总行，公债券必须得到认可，并在国库总行将专门设立的簿记上登记，此外还颁布了偿付利息的各项规定。

根据国库总行所保存的上述帐簿的记载，就在15日这一天，开始对由银行或银行经理人所代表的（在这类业务经营中，这是很通常的情况）债券持有者偿付本息。在这个月的其余几天及这一年的以后各月，支付继续进行；剩下的零散债券，以后在1905、1906、1907、1909和1912年还清。

1904年，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举办了一个国际博览会，古巴的农业、工业和商业部，在土木工程部长曼努埃尔·卢西亚诺·迪亚斯的领导下，专为博览会出版了一本英文和西班牙文的小册子，封面上题为“简明摘要”，其中介绍了这些

公债的历史和古巴政府偿还的情况。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大震动。为此，美国驻古巴公使斯奎尔斯于9月9日向国务卿约翰·海提出一个报告——公文第一〇六三号；并附有一个备忘录，其中详细叙述了1898年5月5日在埃斯特腊达·帕尔马主持之下、于纽约召开的那次会议的讨论情况和决议；还谈到了要求兑现债券，古巴参众两院同意偿还，古巴共和国总统签署为此目的而通过的法令的情况；还谈到为圣路易斯博览会出版上述小册子的情况。斯奎尔斯公使认为，这本小册子的校样，是“在总统府中订正和审查过的”；他还促请国务卿约翰·海注意下列情况：“古巴共和国一经成立，帕尔马先生一经被指定为总统，那些原来出席过1898年5月5日在阿斯特尔大厦召开的那次会议的人物立即聚拢在他的周围。”①

① 斯奎尔斯说这番话，是有缘由的。原来，托马斯·埃斯特腊达·帕尔马在古巴起义者阵营中，是头号亲美妥协主义分子。他作为古巴政府驻美国的外交代表，在美西签订停战协定的第二天，1898年8月13日，竟以古巴政府的名义，同意美西停战协定。1902年5月20日，古巴共和国宣布成立，美国军队撤出古巴，美国扶植了它的这个傀儡埃斯特腊达·帕尔马担任总统。——译者注

到1912年1月11日为止，偿还的一千元票面额的债券已达二千零二十三张，即二百零二万三千美元；到1909年9月9日止清偿的五百元票面额的债券，已有九十八张，即四万九千美元。两者共计二百零七万二千美元。

这就完全彻底地表明，北美合众国始终是古巴独立的敌人。

结　论

I

古巴的独立并不是依靠美国获得的，而是由于本国人民的努力赢得的，他们具有坚定的、不屈不挠的意志，要铲除在暴虐的殖民统治下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贪赃枉法行为、歧视和剥削，争取自由、民主、正义、文化和文明。他们深信，在西班牙统治下，这是不能得到的，所以决心以革命的手段争取独立；经过多次起义和远征以后，有了民族主义觉悟。随后爆发了伟大的三十年解放战争，在战争的最后阶段（1895—1898年），曾得到古巴多数人民群众和美洲大陆古巴侨民的支持。由于解放军不可战胜的强大威力，由于军事将领们出色的军事才能，由于军队的纪律性，士兵的英雄主义和忘我牺牲精神，终于摧毁了西班牙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击败了它的王牌军，尽管古巴当时还必

须对付来自美国的时而冷淡时而敌对的态度。在美国干涉古—西战争之前，西班牙已经处于穷途末路、兵尽财绝的境地，也就正象西班牙轮流执政的政党头子们为了扼杀古巴解放革命所一再扬言的那样：耗尽了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文钱。

II

美国始终敌视古巴的独立，阻挠和破坏古巴爱国者旨在争取向古巴派遣携有军火和医药用品的远征队所作的工作，它顽固地拒不承认古巴为交战一方；相反，曾多次为西班牙提供物质援助，使西班牙得以保持对古巴的统治，而在它不能维持统治时，甚至还帮它恢复这种统治。这种态度，同美国人民在各个时期所表现的一贯同情古巴解放事业的态度相比，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他们在美国境内，对革命活动给予坚决的合作，很多公民参加了战斗，有些人还为自由的古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898 年，在美国终于出现了一个全国性的舆论，不仅支持古巴人民自由和独立的权利，而且要求承认在武装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共和国。

然而美国政府愚弄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在 1898 年 4 月 18 日由国会投票通过而于 20 日由总统批准的“联合决议”，竟取消了参议院原先已经同意的对古巴共和国的承认。

然而美国政府愚弄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在1898年4月18日由国会投票通过而于20日由总统批准的“联合决议”，竟取消了参议院原先已经同意的对古巴共和国的承认。

然而美国政府愚弄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在 1898 年 4 月 18 日由国会投票通过而于 20 日由总统批准的“联合决议”，竟取消了参议院原先已经同意的对古巴共和国的承认。